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2014年
第四期
总第二十八期

合作与交流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独家策划

打造知识经济的
强劲引擎

P26 中芬科学对话：
跨越半个地球的智慧分享

P45 李安山：
我的那些非洲学生

P54 架起沟通
中国与希腊的桥梁

P71 杜宁凯：
逐渐开放的美国精神

北京大学国际校友联络会

北京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始接受留学生的高校之一，60多年来培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万多名留学生，他们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世界各地传承着北大精神。2010年，以庆祝新中国接受和培养留学生60周年为契机，北京大学成立了国际校友联络会，邀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30多名国际校友担任理事会成员，历史系1977级菲律宾校友吉米(Jaime A.FlorCruz)出任首任会长。国际校友联络会设立了完备的组织机构，制定了详细的章程，明确和完善了一系列工作机制，为国际校友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成立以来，国际校友联络会在多方面协助母校开展国际校友工作：收集国际校友数据，充实校友数据库；组织校友活动，加强国际校友之间、中外校友之间、母校与国际校友间的沟通联络；发动校友回报母校，组织国际校友向母校捐资捐物，动员国际校友为母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言献策，邀请国际校友回母校与在校师生分享经验；协助母校开展以国际校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访谈活动等。



◆ 2013年12月11日，国际校友联络会组织部分在京校友返校聚会

合作 与交流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本刊声明:

《合作与交流》所有内容，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摘编、转载和传播。

主 办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编委会主任

夏红卫

编委会

夏红卫 严 军 郑如青
王 勇 李洪权 康 涛

执行主编

韩 笑

执行副主编

徐麟周 刘雯昕

编 辑

刘 东 李晨希 冯子涵
刘世琪 崔雅惠 张伊妍
张金金 陈 娟 林雨晨
景 彤 王子怡

美 编

何 西

图 片

王天天 王文泉

电 话

010-62757453

传 真

010-62751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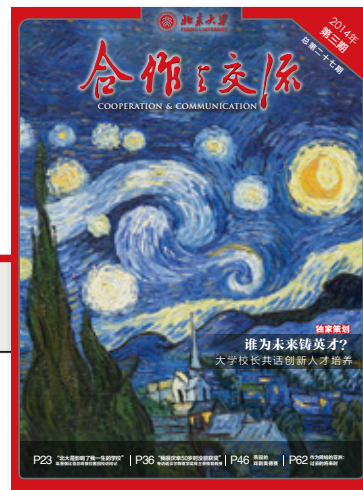
电子邮箱

luoling@pku.edu.cn

网 站

<http://www.oir.pku.edu.cn>

上期内容提要



“北大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回校访问记

7月9日，盛夏中的燕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与其他到访北大的外国政要不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北大毕业生，今日的北大校友。穆拉图在北京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学历教育，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在国政系继续深造，获硕士、博士学位。穆拉图是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所培养的首位外国国家元首，对于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他的这次访问，也让北大师生倍感振奋。

燕园的戏剧奥德赛

燕园的学子来来走走，对戏剧的热爱却始终不改。有的人反复琢磨，寻找戏剧中肢体表现的最大可能；有的寻寻觅觅，将血脉里的异域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戏剧创作；有的远赴重洋，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他们眼中的经典。在这里，你会听到他们的故事，并被这份对戏剧的热忱感动。



P32
独家策划

打造知识经济的强劲引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不断推进，研究型大学将成为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引擎。2014年10月20—21日，主题为“大学与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北大—斯坦福论坛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来自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大学对创新的作用及大学创新的影响因素”、“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排名与创新性教学及研究产出的测量”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课程设置”四个论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P13

群星璀璨“大学堂”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始终把引进国际人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通过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来校讲学，海内外公开招聘教师、特聘长江学者等方式，推动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发展。2012年，北京大学正式推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决心以“人才”为核心战略，通过增强吸引力，提升服务力，在接下来的5年中，每年邀请一批世界级顶尖学者来北大讲学、交流。受邀学者需为国际知名教授或学科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引领本学科保持或赶超国际领先水平。



P42 友谊、信任与创新： “芬兰北大”的国际化

创建于1640年的赫尔辛基大学是芬兰最高学府，被中国朋友们誉为“芬兰的北大”。11月26日，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尤卡·克拉（Jukka Kola）率代表团造访燕园，与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了“纯净芬兰——科学对话”活动，并签署了北大-赫尔辛基合作补充协议。



P45 我的那些非洲学生

本文作者李安山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结识了不少国际学生。文中他回忆了与这些学生教学相长的点滴，并强调，中国只有认真对待国际学生特别是从非洲来的学生，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

合作与交际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2014年 第四期 总第二十八期

时 事

- 04 新闻概要
- 11 辞海拾英

热点聚焦

- 13 群星璀璨“大学堂”

燕园盛事

- 26 中芬科学对话：跨越半个地球的智慧分享

独家策划

- 32 打造知识经济的强劲引擎

人 物

名校掌门

- 42 友谊、信任与创新：“芬兰北大”的国际化
专访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尤卡·克拉

东风桃李

- 45 我的那些非洲学生
- 51 一位新加坡留学生的“行路中国”

北大洋先生

- 54 架起沟通中国与希腊的桥梁
专访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埃琳娜·埃弗拉米多



P57 取一捧乞力马扎罗的雪

2014年7月21日，北京大学教职工登山队成功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该登山队在工会和体教部的支持下，由体教部刘博老师领队，队员有16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同时，2014年正值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50周年，北大登山队带去了北京大学的纪念礼物，传播着中坦间的友好情谊。



P66 一座城，一所大学，一群人

“此时此刻，回首在威尼斯度过的那一段既长又短的学习生活，除了收获满满，我仍然满心期待，期待着有一天能重回威尼斯，继续去探索这座在每个角落都藏着无限惊喜的小城。”



P72 科索沃六记（上）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国际政治研究要么上接天庭，要么下接地气，不能在两者之间地自寻其乐。我没有高深的理论修养，也不愿意在所谓框架或范式里面绕来绕去，而是喜欢行走在研究对象的国度里，去看，去听，去感受那里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文化。”



P69

逐渐开放的美国精神

2014年11月7日，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知名印度研究学者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教授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在北京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当天下午，为表彰杜宁凯校长在大学教育改革以及印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了杜宁凯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授予仪式。

交流

全球舞台

57 取一捧乞力马扎罗的雪

院系风采

59 彼岸观史
北大-耶鲁历史系博士生交流项目十年回望

留学笔记

62 盛放于世界尽头
来自 IARU 暑期学校前沿的报道（续）

66 一座城，一所大学，一群人
2014 春季学期威尼斯大学游学记

观点

学者视角

69 逐渐开放的美国精神

域外心影

72 科索沃六记（上）



学术前沿

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

9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Ecological Urbanism Collaboration, EUC）成立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哈佛大学代表、设计学研究生院院长莫森·穆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执行院长帕特里夏·罗伯茨（Patricia Roberts），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院系师生代表，北京大学名誉校董、西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西平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

北大哈佛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是在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连续多年联合授课与合作研究基础上成立的。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党委书记李迪华向与会者介绍了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的缘起、筹备过程、教学科

研设想及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表示希望通过未来5-10年的合作，两校在保持各自优势研究领域的同时，创造一批直面中国和世界城市化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培养具有解决人类土地、社会、文化难题能力的优秀人才。他期待“北大哈佛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成为促进北京大学教育国际化和学科交叉，推动设计高等教育发展的工作平台。

根据谅解备忘录及两校相关约定，联合实验室将设在北京大学校园，哈佛大学每年选派优秀学者，双方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出版及其它学术交流。双方将组织跨学科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对各项工作的开展予以指导。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十一担任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任实验室中方主任，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院长莫森·穆斯塔法维任实验室美方主任。实验室将向全世界一流学者开放，成为国际生态城市学研究的公共平台。

北大人民医院在心律植入装置感染处理方面位列世界前沿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第七届亚太心律年会（APHRS）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李学斌教授第三次代表中国参会，并在“装置感染处理专题会场”作了题为“中国电极导线拔除现状”的主题发言。与会专家一致评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在心律植入装置感染处理方面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

大会主席及来自美国、新西兰的同行专家对发言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中国在心律植入装置感染处理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尤其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在复杂疑难病例处理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成功经验表示由衷钦佩。

李学斌表示，在电极导线拔除及处理方面，国内病例的复杂程度以及拔除风险均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中国应在电极导线处理方面制定统一的电极拔除规范，为挽救患者生命做出不懈努力。从事器械植入的心脏电生理



12月18日,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对银河系周边大麦哲伦云星系中的NGC1651星团进行了观测研究,并在Nature主刊发表研究成果。图为用哈勃望远镜拍摄的NGC1651星团

医生更加应当通过感染处理,反思植入技术及操作规范,为减少感染并发症做出不懈努力。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胡敏课题组在PNAS上发文揭示北京霾形成机制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胡敏教授课题组与美国德州A&M大学张人一教授合作研究揭示北京霾形成的机制。研究显示,与直接排放至大气中一次颗粒物相比,城区交通等排放的大量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_x)和周边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硫(SO₂)经化学转化生成的二次颗粒物对北京霾的贡献更大,有针对性的控制上述三类气态污染物是治理北京霾的关键。

该成果基于北京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校园内长期运行“城市大气环境定位观测站”观测研究,由大气化学研究团队胡敏教授、邵敏教授、曾立民教授、美国德州A&M大学张人一教授和联合博士后

郭松等人合作完成。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973项目资金支持。成果于11月24日发表在美国著名科学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缩写PNAS)上。

刘征宇教授等关于近两万一千年来厄尔尼诺现象变化机理的研究成果在Nature发表

11月27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刘征宇、陆正遥、闻新宇研究团队及其合作者在*Nature*杂志上发表题为“Evolution and forcing mechanisms of El Nino over the past 21,000 years”的研究论文。他们使用海-气耦合气候模式模拟的近2.1万年来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变化的资料,研究了厄尔尼诺现象对外强迫响应的机理,该结果对理解未来厄尔尼诺现象在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变化有重要科学意义。

生命科学学院罗述金课题组关于白虎的研究特邀为《科学美国人》撰稿

10月,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罗述金研究员和徐霄副研究员应邀为《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撰写的科普文章“Save the White Tigers”在线发表。

该发现首次揭示了白虎的遗传机制及其在演化中的地位,为公众对虎的研究和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研究于2013年6月以封面文章发表于*Current Biology*之后受到新华社、中国科学报、BBC、NBC、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英国泰晤士报等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得到*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高度关注,特邀罗述金课题组为其撰稿并在线发表。

Nature在线发表北大地空学院江大勇国际合作团队有关中生代鱼龙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4年11月5日,《自然》(*Nature*)在线发表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江大勇教授国际合作研究团队以“A basal ichthyosauriform with a short snout from the Lower Triassic of China”（《中国下三叠统一短吻原始鱼龙》）为题的学术论文。这是自2005年12月《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在“Sea Monsters”专辑中报道该团队的发现之后，该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中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该团队依托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在北京大学985工程项目支持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研究项目及面上项目、安徽省地质遗迹保护项目等的资助下，自2008年起，与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共同组织了对安徽巢湖下三叠统地层中的海生脊椎动物化石进行大规模科学发掘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陈鹏课题组在《自然·化学生物学》发文报道活细胞内的“狄尔斯-阿尔德”反应

狄尔斯-阿尔德反应（Diels-Alder reaction）是久负盛名的双烯加成反应，在现代合成化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年来，“逆电子需求的狄尔斯-阿尔德反应”（Inverse electron-demand Diels-Alder reaction），“（逆）狄-阿”反应开始被应用于抗体修饰、材料合成和活体标记等多个领域。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陈鹏课题组长期致力于发展活细胞内的外源化学反应。最近，他们首次在活细胞的蛋白质上实现了“（逆）狄-阿”反应，并将其应用于蛋白酶的激活。相关工作以“Diels-Alder reaction-triggered bioorthogonal protein

activation in living cells”为题于2014年11月2日在《自然·化学生物学》杂志在线发表。

国际舞台

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泰国

9月24日至28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率团访问泰国。期间，代表团拜会了诗琳通公主殿下（HRH Maha Chakri Sirindhorn），访问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与泰方代表共同出席了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并与泰国友好企业家进行了交流。

在泰期间，朱善璐一行拜会了诗琳通公主殿下。朱善璐首先对公主殿下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能够继续获得公主殿下对北大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关心。诗琳通公主殿下希望北京大学加强与朱拉隆功大学在纳米科学以及汉语教学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公主殿下表示，希望在朱拉隆功大学培养一批具有一定汉语水平的理工类学生，并支持他们到北大继续专业学习。

在朱拉隆功大学，朱善璐会见了朱大校长披隆（Pirom Kamolratanakul, M.D.）教授，出席了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成果展开幕式并为成果展剪彩；还与中国驻泰国大使宁赋奎等一同出席了纪念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的文艺晚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应邀在牛津马丁学院作学术报告

2014年9月23日，北大马克

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应邀在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作了“中国在环境全球管治中的参与：一种伦理学反思”的公开讲座。该讲座是由英国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共同主办的“气候伦理与气候变化政策”国际研讨会的一部分。讲座由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德教授主持，牛津大学能源研究院贝尼托·穆勒教授做了点评。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是该校2005年成立的一个专门致力于全球性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机构，涉及全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新型人权等诸多议题。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赴非洲抗埃博拉勇士曹宝平凯旋

2014年11月15日清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曹宝平副主任医师圆满结束几内亚抗埃博拉工作回国。由党委书记陈红带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迎接队伍早早地等候在了首都机场。大家在机场拉起了横幅，热切地翘首企盼抗击埃博拉英雄的凯旋。终于，曹宝平大夫出现在了出口，机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曹宝平大夫立刻被鲜花和拥抱包围。

第三批中国赴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专家组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曹宝平、北京佑安医院牟丹蕾、北京疾控中心王劲三位专家组成。自2014年10月17日抵达几内亚后，在中国驻几大使馆和经商处指导下，专家组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式开展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广泛赞誉。11月13日大家圆满完成工作启程回国。

曹宝平大夫在几内亚期间，不辞

辛劳，经常深入到施工现场、临床工作一线进行实地考察。专家组成员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充分展示了中国感染病、急重症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的风采。曹宝平大夫在到达几内亚当日就开始协助医疗队诊治危重病患，并多次前往中几友好医院义务会诊。专家组还深入到几内亚科纳克里埃博拉治疗中心之一东卡医院实地考察，获取几内亚埃博拉防控措施第一手资料。曹宝平大夫和专家组其他成员通过大使馆、WHO SEOCC 驻几内亚办事处、WHO 网站等途径获取埃博拉疫情最新信息，汇总并分析疫情数据，总结防治经验并撰写工作报告。此外，专家组还举办讲座，普及防控疫情及常见热带病的相关知识，与医疗队共同编写《“埃博拉”“疟疾”防控手册》等。

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在2014年世界合唱比赛中斩获两金

2014年7月9日至19日，第八届世界合唱比赛在被誉为“欧洲文化之都”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参加了本次比赛第二赛段室内混声合唱组和现代派音乐合唱组两个组别的比赛。在合唱团指挥侯锡瑾教授和全体合唱团团员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在两个组别的比赛中斩获两枚金牌，圆满地完成了比赛任务，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大学的风采，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世界合唱比赛由德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被誉为合唱界的“奥林匹克”盛事。2000年首次在奥地利林茨亮相，随后每两年一届，分别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举行。这项赛事堪称全世界规

模最大的合唱比赛，每一次举办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大赛不断为世界合唱音乐注入新的力量、产生新的影响，为各国优秀的合唱队伍提供展示自我、相互交流的平台。2014年的世界合唱比赛在拉脱维亚的美丽古城里加举办，共有来自世界7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支合唱团参加本届世界合唱盛会，歌者数量达2.7万，赛事规模和参赛人数均创新高，为里加历来文化活动之最。

北大女生侯逸凡勇夺法国科西嘉国际象棋大师赛冠军 成为首位夺冠女棋手

日前，一年一度的法国科西嘉国际象棋大师赛落幕。作为赛事唯一的女棋手，现任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北大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本科生侯逸凡，在比赛中连续淘汰包括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男子国际象棋超快棋世界冠军克拉夫茨夫在内的3位男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成功闯入最后的决赛。在决赛中，面对刚刚在半决赛爆冷淘汰5届世界冠军得主阿南德的乌克兰特级大师菲德尔丘克，侯逸凡沉着冷静、机智过人，在15分钟快棋赛中连下两城，零封对手。侯逸凡也因此成为这项传统大赛中首位夺冠的女棋手。

侯逸凡在本次比赛中一举超越前世界棋王、即将参加2014年世界冠军对抗赛的印度名将阿南德勇夺冠军的神奇表现，创造了前无古人的棋史纪录，也引发了世界棋坛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法国当地报纸用“历史性胜利”为标题，大篇幅地报道了中国女生、世界棋后侯逸凡的夺冠故事，并把侯逸凡与棋史上的伟大传奇相媲美。

北大荣誉

北大柯杨教授当选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当地时间10月20日，美国医学科学院(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IOM)在第44届年会上公布了新一届增选院士名单，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当选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次，美国医学科学院共新增选10位外籍院士和70位美国本土院士，其中有2位来自中国。

柯杨在北京大学除分管医学部全面工作以及长期从事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的环境及遗传因素研究以外，还担任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21世纪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理念创新项目专家委员会主席、美国学术型国际医疗健康中心指导委员会(AAHCI)委员等职务。此外，柯杨还是中国参与国际医学教育改革与合作的主要领军人物。她自2010年起担任21世纪全球卫生人才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为加强卫生体系而改革医学教育的国际努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美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70年，以其科研水平而闻名于世界医学学术之林。每年，由现任院士依据被提名学者的专业成就、对健康领域的贡献等多个方面增选产生最多70名本土院士和10名外籍院士，以表彰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高效计算与应用中心主任、“千人计划”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讲席教授丛京生教授论文获选IEEE/ACM计算机辅助设计国际会议“十年最有影响力论文奖”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丛京生教授论文获选IEEE/ACM计算机辅助设计国际会议“十年最有影响力论文奖”

12月初，在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美国计算机学会第33届计算机辅助设计国际会议（IEE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Aided Design）上，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高效计算与应用中心主任、“千人计划”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讲席教授丛京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三维集成电路的一种热驱动布图算法》（A thermal-driven floorplanning algorithm for 3D ICs）获得 ICCAD 2004 至 2014 年“十年最有影响力论文奖”。该论文被高度评价为十年来 ICCAD 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方向上所收录的、在研究和工业设计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

北大宗传明教授作为中国学者首获美国数学会大奖

近日，美国数学会 2015 年度各项

大奖陆续揭晓。其中，莱维·柯南特奖被授予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Lagarias 和北京大学教授宗传明。颁奖仪式将于 2015 年 1 月 11 日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召开的美国数学会年会上举行。这是美国数学会首次将学会大奖颁发给在中国工作的数学家。

据悉，宗传明与 Lagarias 的获奖工作——“神秘的正四面体堆积”，系统评述了正四面体的堆积理论。该成果不仅全面评述了数学家和材料学家在研究这一著名问题上已取得的主要成绩，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猜想，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当时的评述文章尤其重点报道了宗传明在希尔伯特第十八问题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物理学院教授出任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专业委员会职务

11月4日至7日，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在学会理事长詹文龙院士的带领下，赴新加坡出席了第28届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全体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28届执行委员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物理学院龚旗煌当选 C17 一激光物理与光子学专业委员会秘书，朱星当选 C2 一物理符号单位名词等专业委员会委员。IUPAP 于 1922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是国际物理学界级别最高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国际组织，是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物理学工作者的群众团体。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黄卓论文获国际权威期刊最佳论文奖

10月16日，应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宣布，将其 2012 年至 2013 年度“Richard Stone 最佳论文奖”授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在 2012 年 9 月发表的论文“Realized GARCH: A Joint Model for Returns and Realized Measures of Volatility”。

“Richard Stone 最佳论文奖”创立于 1991 年，每两年评选一次，授予在过去两年中发表于 *Journal of Applied*



9月9日下午，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Christopher Pyne）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表题为“中国与澳大利亚：我们珍视的教育伙伴关系”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中国高校在世界排名前两百的学校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高等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且潜力巨大。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不仅对于青年人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Econometrics 的一篇最佳论文，是应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奖项之一。此前只有一位华人学者获得过该奖项。

北大人民医院眼科赵明威教授荣获中美眼科学会眼科研究最高奖“金钥匙奖”

10月初，在中华医学会2014年第十九届全国眼科学术大会上，赵明威教授被授予中美眼科学会眼科科学研究最高奖——金钥匙奖，以表彰他为我国眼科科研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金钥匙奖于1992年由中美眼科学会设立，奖励在中国眼科科学研究工作中有创造性的新发现、新理论，对眼科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研究成果的眼科工作者。该奖项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委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并在全国大会期间颁发，全国每年获此奖励的仅一人。此次赵明威教授获奖，是由现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宁利教授提名，经眼科学分会常委会讨论一致同意通过，以表彰赵明威教授在眼科临床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五洲宾朋

詹姆斯·佩里教授北大阐述“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起源、发展与未来”

11月24日，著名公共行政专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校长特聘教授詹姆斯·佩里（James L. Perry）应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邀请，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报告厅作了题为“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起源、发展与未来”的演讲。

作为“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概念的提出者和奠基者，詹姆斯·佩里教授的本次报告围绕该主题展开。从概念界定开始，詹姆斯·佩里指出，PSM就是“个人主要受或完全基于公共制度与组织的动机所驱使的倾向”，并指出了其与利他主义和趋社会动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他者。接着，詹姆斯·佩里教授回顾了1982年PSM提出以来的三波研究浪

潮。最后，他展望了未来PSM研究的方向，包括多层分析、实验研究和测量方法的改进，并简述了中国的PSM研究。报告结束后，詹姆斯·佩里教授就“中国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美国政党角色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公共服务动机概念操作化细节”以及“如何帮助中国的公务员更有动机地提供公共服务”等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访问北京大学

9月9日下午，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Christopher Pyne）一行到访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湖心岛鲁斯亭热情会见了派恩先生一行，并就中澳两国的教育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恩哥首先对派恩先生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他指出，随着北京大学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中澳两国的教育交往不断增强，学者、学生的交流互动也愈发频繁。在会谈中，

派恩先生提到，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教育部长来华。他指出，中澳两国建交已逾四十年，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紧密，对于两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澳大利亚高校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国际化发展，并且目前已有约百分之四十的澳大利亚学生在学习除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以更好地为走向世界、感受各国文化作准备。

会谈结束后，派恩先生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北京高校的师生代表作了题为“中国与澳大利亚：我们珍视的教育伙伴关系”的主题演讲。

碳循环专家Philippe Ciais访问北京大学并作学术演讲

10月28日，法国原子能与可替代能源委员会科研主任、北大客座教授Philippe Ciais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师生展开交流。同时，Philippe Ciais教授还在生命科学学院邓祐才报告厅发表了学术演讲。本次讲座属于“法国杰出科学家讲坛”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大学与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共同举办。该活动是为了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旨在推动中法科技交流。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 展望亚太区域经济发展

10月23日下午，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先生做客光华管理学院，作了题为“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及中国未来发展挑战”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金

融系副教授赵龙凯主持。中尾武彦首先探讨了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接着针对亚洲经济现状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比较稳定。最后他阐述了自己对“为什么不同国家在发展层面上会产生巨大差别”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哈佛大学詹姆斯·安德森教授访问北京大学并作学术演讲

10月16日至19日，美国哈佛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化学与生化学系讲席教授詹姆斯·安德森（James G. Anderson）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与物理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展开交流。同时，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入选者，安德森教授还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发表了学术演讲。

17日上午，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院士会见了安德森教授，并向安德森颁发了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奖牌和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聘书。物理学院和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部分师生与安德森教授进行了座谈。物理学院及国际合作部相关人员陪同。

“2014第二届北京大学中韩关系对话”成功举办

2014年10月17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韩国东亚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4第二届北京大学中韩关系对话”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交流中心成功举行。会议围绕“习近平-朴槿惠会谈成果：评价及前景”“中韩经济合作动力与前景：向何处去？”以及“重建中韩两国人文纽带”三个议题展开。来自中韩两国的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及在校学生170人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韩国东亚基金会理事长、外交通商部原部长孔鲁明分别致开幕辞

弗朗克·韦尔切克教授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并作学术报告

10月14日下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Herman Feshbach讲席教授、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朗克·韦尔切克（Frank Wilczek）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到访北大，并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作学术演讲。本次演讲同时也纳入北京大学百年物理讲坛第十二讲、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大师讲堂”第五讲。来自物理学院和北大其它院系，以及清华大学、北师大、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200多名师生聆听了韦尔切克教授的精彩报告。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来北大演讲

9月5日，受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和国际知名传记文学作家莫妮卡·劳利曾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报告厅发表演讲。同时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演讲会的还有旅居瑞典的著名翻译家、编辑家万之，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著名作家李洱等人。演讲会由北大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陈晓明主持。

“人文交流是开启人与人理解之门的一把钥匙。友好根植于理解，信赖起源于共识。人文交流作为心灵的“解码器”，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摒弃成见与隔阂，相互了解、彼此走近。人文交流是构建国与国友好关系的坚实支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能使不同国家的人们培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文情怀和尊重包容的相处之道，为国家关系厚植社会土壤。”

——2014年11月7日，第十一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开幕，三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和各界领袖汇聚北京，共论文明的和谐与繁荣。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宣读了李克强总理的贺信并致辞。她在致辞中这样阐述人文交流的意义。

“有两个人争论，什么时候是黑夜的终结和黎明的开始。一个人说，去观察四条腿的动物，如果你能分辨出它是绵羊还是山羊，那么天就亮了；另一个人说，不对，应该去看一棵树，如果能分辨出它是橄榄树还是核桃树，那么天就亮了。他们去找智者，智者说，你们都错了，应该去看人，如果找到一个女人，无论她是黑人还是白人，你都认为她是自己的姐妹；如果找到一个男人，无论他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你都认为他自己的兄弟。那么黑夜就已过去，黎明已经来临。”

——2014年11月9日上午，美国前卡特政府高级顾问、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伊·埃茨昂尼（Amitai Etzioni）应邀在北京论坛闭幕式上做题为“国与国：共建全球社区（Toward a community of nations）”的主旨报告。报告结尾，他以一个精彩的寓言来说明全球社区的重要性。

“以正直为基础，领导风格透明化，有做决定的勇气并知道如何应对成败，敢于向未知领域迈进，敢于将远见化为实际。”

——这是印度前总统、著名导弹科学家阿卜杜勒·卡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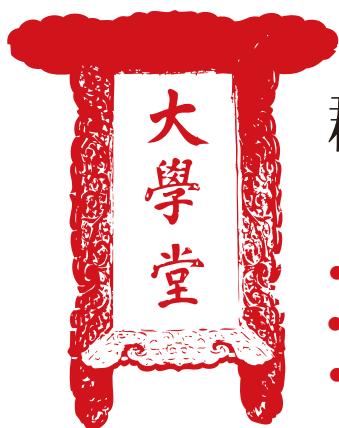
◆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论坛（2014）开幕式上致辞

博士对于领导力特质的理解。11月5-7日，卡拉姆博士访问北大，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与北大学子一同探讨“创新型领导力”。

“1973年11月18日下午4点，这是我一生汉语岁月的开始。记得那是法航一架开往北京的试航航班，航线如此遥远而曲折：先是降落在罗马停留两小时，继而驻埃及开罗经停两小时，再到卡拉奇，再到缅甸首都，直至19日晚22点，终于在北京首都机场落地。回想起来，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中国学习汉语？有的人追求相近、熟悉、倾向于走向熟路，也有人一直追求踏上陌生的、被人没走过的陆地，向往发现疏远的境界。对大多数西方

汉学家和汉语学习者而言，对陌生的向往，以及对发现另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渴望，让他们将目光转向了遥远的中国。”

——现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的知名汉学家白乐桑，曾于1974—197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9月，在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举办的“我的汉学之路”会议时，他回忆自己初涉中国的印象。



群星璀璨 “大学堂”

- 离地一万里：探索臭氧层里的人类命运
- 擦亮人们认知的大门
- 王赓武：以史为镜 文明无界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始终把引进国际人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通过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来校讲学，海内外公开招聘教师、特聘长江学者等方式，推动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发展。2012年，北京大学正式推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决心以“人才”为核心战略，在接下来的5年中，每年邀请一批世界级顶尖学者来北大讲学、交流。受邀学者需为国际知名教授或学科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引领本学科保持或赶超国际领先水平。

自2012年计划实施以来，已有一批世界学术大师通过该计划的资助与支持来校讲学，在传播所属学科前沿研究成果与前瞻眼光的同时，也广泛地提升了北大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深入采访了近期入选“大学堂”顶尖学者的王赓武、詹姆斯·安德森、弗朗克·韦尔切克三位教授，展现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思想成果和他们独特的学人风采。

离地一万米：探索臭氧层里的人类命运

专访哈佛大学詹姆斯·安德森教授

文 裴苒迪

就 像中国北方的冬天会有大雪、棉袄和美味的冰糖葫芦一样，美国人的夏天也有三样标示性的东西——热狗、西瓜和频发的雷雨。一般人可能只会对愈加频繁和猛烈的夏季雷雨感到不适，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却在研究这些雷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让很多人倍感震惊的结论——“曾被我们认为已经解决的臭氧层破坏问题，其实并未解决。”而臭氧破坏带来的更多紫外线则很可能意味着以下灾难——更多的皮肤癌和白内障，海洋生命赖以生存的浮游生物遭到破坏，以及农作物枯萎导致的粮价飞涨。

就在几年前，很多人还不愿相信安德森的说法，他们更愿意宣称：臭氧问题已经成功解决。因为人们自以为已经控制了导致臭氧层空洞的元凶，一种来自空调和各种喷雾的有机物，氯氟烃（CFC）——旨在淘汰氯氟烃使用的《蒙特利尔协议》（Montreal Protocol）已被197个国家签署。于是，面对安德森的研究申请，NASA说“Go Away”，臭氧问题已经解决；面对安德森的大胆假设，他在MIT工作的好朋友兼同行对他说“Impossible”。

但安德森始终没有放弃。十多年来，他坚持完成这项艰难的证明——在雷雨和臭氧层破坏之间建立联系。为此，他不惜一次次动用热气球或者

侦察机飞到距离地面1万米的高空收集数据，并一次次写信给NASA的负责人请求对这项研究的重视与支持。

终于，在2012年，他找到了确凿的实验证据。多年来的固执已见成了坚持真理，人们现在说，安德森在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问题之间建立了革命性链接。美国科学院院长、大气科学家拉尔夫·塞瑟罗恩（Ralph Cicerone）这样说道，“安德森确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10月17日，安德森教授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入选者，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面向来自物理、化学、环境等院系以

及清华、中科院、中国气象局等单位的近300名师生，发表了题为“气候变化的物理化学问题及其全球性挑战：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的科研合作”的演讲。之后，还与听众和学术记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流，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历程和体悟。

振聋发聩的结论——“曾被认为已经解决的臭氧层破坏问题，其实并未解决。”

曾经，面对安德森拿来的奇怪数据，MIT的科学家Kerry Emanuel（安德森的好友兼同行）说：“这不可能！”



◆ 詹姆斯·安德森教授（右）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同行讨论

而 2012 年，他承认：“安德森的工作证明，我们最好重视气候变化和雷暴之间的关系。”

曾经，面对安德森提交的研究报告，美国宇航局（NASA）的负责人说：请你走开，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通过逐步停用氯氟烃，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安德森说的对，臭氧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也许你会好奇，这个令很多人感到惊奇甚至拒绝相信的结论，最初是怎么出现在安德森脑海中的？研究的缘起来自于一次反常的探测结果。2001 年起，安德森和他的团队有了一项奇怪的发现——他们的设备在大气层的最高层即平流层，探测到了极高的水分子浓度。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在一般应该非常干燥的平流层探测到高浓度的水分子，就好像在萨拉哈沙漠发现海豚一样稀奇。

一般人也可能会认为这稀奇的现象其实也没什么大碍，但安德森却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因为，根据他此前数十年对地球臭氧层损耗的研究来看，水分子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摧毁这些臭氧。而正是位于平流层的这层薄纱般的臭氧，挡住了大部分射向地球的紫外线，大大改善了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

当他第一次把这个奇怪的监测数据和自己大胆的设想告诉别人时，几乎没人相信，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但就在 2012 年，安德森用数据证明了雷暴和平流层高浓度水分子之间的联系。讲座中，安德森对这个联系进行了耐心的讲解，即便是对我这个文科生而言也不显得复杂。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强烈的雷暴会在空中一股强大的上升气流，而这股气流就像一个气态的电梯，会把热量、湿润的空气带向大气层。通常而言，这个气态电梯会在平流层的底部就停住。但是，如果一个雷暴足够强，这股上升气流就能冲进平流层，把水分带进去。而随着气流的上升，温度会不断下降（感兴趣的人可以在下次乘坐飞机的时候摸一摸玻璃），于是水蒸气会凝结成液态水，并凝结过程中释放出热量，让周围空气的温度增加，而这些空气里就残留着大量的氯氟烃，它们会因为这个热量而更有活性，去侵蚀那层薄纱般的珍贵臭氧。于是，雷暴、水分子、臭氧损害之间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

更重要的事情在于，安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忧心的可能——全球变暖会影响雷暴，进而影响臭氧层。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变暖，这种能够把水蒸气注入平流层的雷暴可能会更猛烈且频繁（近几十年来美国夏季的雷雨数据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而会带给平流层更多的水分，导致对臭氧更大的破坏。

就这样，安德森在气候变化和臭氧损耗之间建立了革命性的链接。而此前的三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声称，这两个环境问题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安德森所做的正是把所有复杂的部分都拼起来了，是什么把越来越多的水注入大气层高层，而那又如何引起了臭氧层破坏，他提出了这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性。”美国科学院院长、大气科学家拉尔夫·塞瑟罗恩（Ralph Cicerone），这位曾经在臭氧领域做过开拓性工作的学者对安德

森做出了高度评价，“他确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而几十年前首次提出了气候变暖的危险性，并指出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暖元凶的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也相信安德森是对的：“随着气候变暖，这种被我们称为‘湿对流’的东西，会渗透到大气层的更高处。”

安德森的研究历程又一次向我们证明，在科学领域，有时候固执己见真的可能变成坚守真理。

艰难的研究历程—— “夜袭用的侦查机就在我们隔壁的机库起飞”

然而，固执己见的历程并不容易，甚至可以用艰苦卓绝来形容。当然，了解安德森的故事之后，你也许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他的研究实在是太酷了！

你是否想过，把自己的研究设备放到巨大的热气球里，甚至是放到美国宇航局提供的侦察机里，再把它送上美国、智利、南极等地的高空去？安德森的研究中，许多数据就是这么得来的！早在 1987 年，他和团队制作的研究设备，就装上了美国宇航局的 ER-2 飞机，那算是一个 U-2 侦察机的民用版。

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安德森，不能保持飞机或者热气球为他随时待命。其实，这些机会是美国宇航局主动为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提供的，而这种机会每年只有不多的几次，需要经过一定的申请过程才能获得。而安德森每年都不放过这种机会。

事实上，使用美国宇航局的飞机



飞上万尺高空做研究，也并不总是想象中那么浪漫和惬意。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也因此经历过不少紧张时刻。

比如，2012年的8月，安德森需要一架飞机从智利的港口城市彭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起飞，探测当地大气层的数据。而当时，智利的军队正对阿根廷处于戒备状态。“夜袭的飞机就在我们隔壁的机库起飞”，安德森回忆道，“而我们身边是一些刚满18岁的士兵举着AK-47s保护着我们。”

还有一次，安德森和同事要让飞机从瑞典出发，到北极附近做一次高空探测任务，结果莫名其妙地延迟了一阵。后来他才知道，延迟的原因，是工作人员不得不紧急去和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打电话，告诉他们这架飞机只是要完成一项科研任务，绝对不是间谍活动，请对方千万不要击落它。

对高空研究的一次次坚持换来了宝贵的数据和发现。2000年，一架ER-2飞机在缅因州的班格尔发现了“美国上空极高浓度的一氧化氯”。而正是那次差点被俄罗斯击落的飞行，让他发现北极正在出现跟南极一样的大规模臭氧损耗。

同时，在最初提交的报告被美国宇航局拒绝甚至忽视之后，安德森也没有放弃努力，他反而写更多的信给美国宇航局的高层，不断向他们重复着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重新审视臭氧破坏问题。终于，他获得了一个同情他的听众，即美国宇航局高层大气研究项目的主管肯·朱克斯（Ken Jucks），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安德森争取到了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自己的团队。

安德森还异常勤奋。有一次，一

个记者清晨就到办公室去等他，却发现他已经在办公室工作一个多小时了，而周边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还是空荡荡的。

正是在这样的不懈坚持和勤奋钻研之下，安德森找出了臭氧损耗的完整循环，在全球变暖和臭氧损耗这两大环境威胁之间建立了联系。在一些科学家都认为，主要是飞机排气造成的水分子会危害臭氧层时，安德森为我们证实了一些更为平常的东西，比如在美国夏天跟西瓜和热狗一般普遍的雷暴，也会提供这种足以扮演臭氧杀手的水分子。安德森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臭氧损耗问题，但我们还没有。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气候变暖加上臭氧损耗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比单纯的气候变化严重得多。”

负责任的好老师——“他每次上课都会烧点什么或者来个爆炸”

直到今天，安德森还没有停止他的研究，而且还经常到不同大学讲学，年届七十依然坚持工作，可以说，老先生对科研的勤奋热情让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但如果你以为，学术研究就是他唯一的兴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在努力钻研自己的学术之余，安德森绝对一名不折不扣的超级好老师。他尤其对于本科生教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直到现在还亲自为本科生上课。他会把入门级的物理基础课讲的生动有趣，比如，他会让学生计算自己的个人能源消费量，他的同事亚当·科恩(Adam Cohen)曾在一次报道中说，“他每次上课都会烧点什么东西或者搞个爆炸什么的。”在讲座现场，有人就此向安德森求证的时候，他笑着说：“的确是这样，我常常在课上点燃氢气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其实最开始，我也是按照老办法去教新生物理化学，但我发现，大概有90%的学生都不及格”，安德森说，“我感到，那样浪费了大量的创造性天赋，而且让学生对科学失去兴趣，很难再回头。”

“其实物理和化学，是人为地被区别开来进行教学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在19世纪，这些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可我更希望，每个人都能懂得这些学科最重要的基础知识，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学科。我甚至很希望其他学科的人，比如经济、法律、新闻等专业的，也能够明白，重要的科学进步对于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说起自己的研究兴趣如何发生，安德森向同学们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的往事。也许，他最早的兴趣来自他父亲那间位于家庭地下室里的小小机械修理店。就是在那里，6岁的小安德森曾制作了自己人生第一台模型飞机，而他七年级的时候已经在造船了。而每年夏天，他则会和爷爷奶奶在爱达荷州的庞德雷(Lake Pend Oreille)湖边度过。在那里，他会修理船只的舷外发动机，或者建造树屋、堡垒、木筏、收音机等等。所有这些儿时的经历，都为他日后对科学研究发生兴趣奠定了基础。

而他真正发现自己的具体研究方向与兴趣，则是在华盛顿州大学拿到物理学士学位后，到科罗拉多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期。后来，他又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大气与空间物理实验室里，发明了一种独创的方法，来测量平流层中极低浓度的自由基——携带一个电荷的原子团。“自由基简直是

所有化学反应之神”，安德森满怀热情地回忆道，无论是铁皮生锈还是烟雾生成的过程，自由基都是重要催化剂。而他想出来的这种探测设备，能够测量出浓度低到一万亿分之一的自由基含量，这相当于一个奥运会比赛规格的泳池中找几粒沙子，而且被一个火箭抬到高处。

此外，他对开展国际科研合作也有很大的兴趣。说起来，安德森教授跟中国、跟北大，还颇有一点渊源。他的父亲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物理系主任，也曾在民国期间短暂来北平的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其实就是在今天的燕园里。而在这次讲座中，他也特别强调了中美之间科学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域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而北大、哈佛这两所大学早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应该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为解决全球变化问题作出贡献。C&C



◆ 安德森教授演讲结束后接收学生采访

擦亮人们认知的大门

专访弗朗克·韦尔切克教授

文 冯彦君



弗朗克·韦尔切克 (Frank Wilczek) 教授 1951 年 5 月生于美国犹太裔家庭，在纽约皇后区的公立学校中完成了他的早期教育。1970 年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72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74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理论物理所，并担任 Nordit 大学访问教授。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 Herman Feshbach 讲席教授。韦尔切克教授的研究内容异常广泛，包括了凝聚体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韦尔切克和他的导师戴维·格娄斯发现了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渐近自由，因此共同

获得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此理论表明随着夸克之间的距离缩小，其强相互作用逐渐减弱，假如两个夸克之间的距离极其近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核力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它们可以被看作是自由粒子。这个理论对于量子色动力学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韦尔切克还参与了轴子、任意子、渐进自由、夸克物质的色超导性和量子场论的其它理论的发展。他的工作范围异常广泛，包括了凝聚体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

2014 年 10 月，韦尔切克教授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奖学计划”，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一个美丽的诉求：探索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演讲并和物理学院的师生展开学术交流。访问期间，韦尔切克接受了北京大

学国际合作部记者的专访。在北京大学的访问过程中，韦尔切克不断提到“自然的美丽”。正是对于自然的敬畏和求索的精神使韦尔切克在理论物理的探索中找到了真正的哲理。

一个美丽的诉求：科学探索之路上的满天星斗

记者：您在今天的和之前的演讲中多次引用威廉·布莱克的诗句，“如果人类认知的大门被擦亮，那么人们会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无极。”您也多次提到自己在从事着“擦亮人们认知的大门”的工作。那么，您想给人们带来怎样的认知呢？

韦尔切克：我可以谈谈我最近的工作。最近，我在进行色彩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人们的认知水平仅仅被开发了一小部分。人们依靠某些种类的蛋白质来接受并且感知光线；色盲者缺乏某些种类的蛋白质，但是其他物种可能拥有更多的感知光线的蛋白质。一些鸟类和昆虫含有四五种色彩感知器，它们甚至可以感知到红外线、紫外线等对于人类来说的不可见光。我们必须认识到，有很多事情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也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我希望能够将这些不被我们感知的事物重新带到人们的认知世界里面来。人类的认知只是浩淼无穷的认知的世界中小小的一部分。一个容易被理解的方面是，色盲者并不能看到

很多正常人能够感知到的色彩，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开发出一种可穿戴设备，或者是一种能够在电脑上使用的设备，来帮助色盲者感知到原来不被他们感知到的色彩？我觉得进行此类研究是十分有帮助的。

记者：这种想法确实很伟大！在您今天演讲的开头，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美丽的思想吗？”在您看来，您的研究里面最美丽的发现是什么？

韦尔切克：我认为在我的研究中，用美丽的等式来表示粒子之间强相互作用力（也是自然界最基本力的作用规律）的发现是令人惊叹的——当然，大部分的等式都是很美丽的！将一种伟大的作用力用等式表示出来并且加以运用是一项伟大的发现，它引导我们在了解物质的基本规律、粒子加速对撞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项理论也在数学上与其他领域的理论正相关，这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可以去假设并且补充“所有的力都可以被统一”这一理论，并给予这一理论以逻辑上的严谨性。

美丽的结果：科学研究的内在统一性

记者：您认为统一性是科学中的美感的一种吗？

韦尔切克：当然。

记者：那么您认为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这统一的哲学内涵吗？

韦尔切克：我想我不会将其称之为“哲学”，逻辑严谨的数学表达能让我们有基本的描述事物的方法。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范围非常广泛，从最小的粒子到最浩淼的宇宙。这在常人看来很难理解啊！



韦尔切克：我喜欢粒子物理学，这些研究非常吸引我。我也做过一些天体物理的研究。事实上，这些领域都是高度内在相关的。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宇宙大爆炸理论是非的有帮助。同时，天体物理学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我的研究领域十分的广泛，我对于研究过地球深处的事物，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研究神经生物学和计算机。事实上，如果你学好那些基础科学的话，你可以对很多领域感兴趣（并且有机会获得一些深入的见解和看法）。我现在可以很轻松地看出在其他领域，什么研究是有价值的，什么是不值得去尝试的。

美丽的生活：科学研究的一路繁花

记者：众所周知，您在科学研究之外，在诗歌、科普写作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如果您没有从事科学研究，您一

定会成为一位有造诣的文学家。请问您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在您的闲暇时间，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韦尔切克：我很享受阅读，也很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徒步行走。当然我也很享受钢琴，经常弹奏。夏天我喜欢游泳。我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家庭生活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我最喜欢、最着迷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填字游戏和逻辑字谜！现在我玩这类游戏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我也喜欢国际象棋。

记者：如果您可以回到您的大学本科时代，您会给您自己提一些什么建议呢？

韦尔切克：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多小事情上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可是我觉得我也不会提一些与我当时的做法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会告诫自己：好好做你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一个开阔的眼界，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囿于一个小圈子，努力去拓展不

同的领域；另一方面，一个让我觉得受益终身的方面是，我一直很享受数学，这不仅仅是工作的要求，我也发自内心地喜欢数学带给我的乐趣。其实在数学上，我也是可以做得更加系统并且有效率的。我觉得在计算机领域，是可以改善的。我学习过一些计算机知识，但是只是皮毛，并没有深入地进行探索。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为了一门强大的学科，我真希望我当时给予这一领域更多的重视。

一般来说，我会建议同学们对基础科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当他们想从事理论科学方面的研究。理论科学要求你尽快学习并且掌握数学基础知识，数学基本上就是你的双学位。数学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就像是一门语言一样；尽早学，学得越快，那么你的研究工作就会越容易。反之，如果数学起步很晚，那么在理论科学领域，你的成就就不见得会有那么大。

另一条建议是，广泛地涉猎很多领域，对别人提出的新观点、新领域加以探索，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就像经济学里面，你不能把

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你也不能把宝贵的研究资源放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里。

记者：您能谈一下您对于当代教育，尤其是教育领域的革新的看法吗？

韦尔切克：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专家对此已经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在此我就谈谈我的一些小的想法吧！我觉得逻辑思维的培养对于科学研究，不管是理论物理，数学，计算机，还是经济学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清楚中国的情况；在美国，有很多报刊杂志上有逻辑题目，其中有很多题甚至是相当有难度。人们可以一边享受一个美丽的故事，一边尝试着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将这一类的逻辑思维的运用到课堂当中来会是非常有益处的。这些类型的逻辑训练对于很多人来说并没有严肃的数学题目，诸如几何、代数那么可怕，而严肃的数学题也会让人敬而远之甚至是心生憎恶，并且并不是每个人的数学都会很好。所以这些字谜，尤其是逻辑字谜，会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逻辑系统，但不会使人们直接接触到可怕的数学。C&C

11月上旬，300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和各界领袖齐聚由北大参与主办的第11届“北京论坛”。11月7日，恰逢立冬，84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特级教授王赓武（Wang Gungwu）先生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以及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等顶尖学者，分别担任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

在题为《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Borderless Civilizations: Lessons from History）的英文主旨演讲中，王赓武先生指出，以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学界，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作为与西方文明同等距离的两个对立面，这一观点失之偏颇。在他看来，不同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不仅没有所谓的“一神信仰”，而且对儒家经典之外的诸子学说也相当重视；中国的信仰结构与知识体系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西方不应用一个范式去理解它。

其实，早在2004年首届“北京论坛”期间，在以“多文化共存下的记忆与遗忘”为主题的历史分论坛上，王先生就曾做报告《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局限》。十年前后，王先生的思虑与关怀可以说遥相呼应、一脉相承。

立冬次日，作为今年“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该计划2012年启动以来，陆续邀请过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和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等国际知名教授或学科领





王赓武：以史为镜 文明无界

裴苒迪 燕舞

域内的顶尖学者)所邀请的国际学人，王赓武先生现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身着灰色西装、银色短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他，用流利汉语奉献了一场精彩演讲《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

祖籍河北正定的王先生从青少年时期辗转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南京、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生活与求学的经历讲起，将中国南方边境上数百年来各方势力的进退退、盛衰兴亡娓娓道来。

王赓武先生与海外华裔史学大家

余英时先生、许倬云先生等齐名——而且三位同属1930年生人，他被公认为当代“海外华人研究”(Overseas Chinese Studies/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的奠基人之一，是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其代表性著述有《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和《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1800年以来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交错：战争，贸易，科学与政

务》、《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

1957年，王赓武以论文《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其间，年仅32岁时就成为费正清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 1968)中最年轻的作者，33岁即升任马来亚大学教授；1968年开始，先后出任澳洲

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

在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等众多管理者角色之外，王赓武先生的一个重要身份是作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家，他1986年至1995年担任了近十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卸任前一年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王赓武先生有着较深的香港情结，早在1980年，他就与人合编过《香港：发展的困境》；1997年香港回归当年，他编过两册《香港史新编》，两年后又与人合编了《回归中国后的香港：转型的挑战》；2007年6月，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刊发论文《走向新的现代性：香港回归的历史视角》（Towards New Modernity: The Return of HongKo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王赓武先生访问北京期间，我们专访了他。

访谈

边界与民族国家

问：在《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那场英文演讲中，您首先提出了一个讨论的大前提，即“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其实是一个比较晚近的概念，它诞生于17世纪的西欧地区。这让我们联想起您演讲中所使用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边界”（border），它其实也是很晚近的、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才产生的概念。在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化问题时，“边界”

是否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概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怎么看待“边界”这个概念？

王赓武： “边界”（border）的确也是一个晚近的、从西欧历史里演变而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是为了大家方便使用，指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就不成问题；但如果变成了一条严格的“线”，意味着你走过来我就可以抓你或开枪，那就很危险了。

“国界”就是这样，已经成了一种非常严格的东西。西欧原本没有严格的“国界”概念，是在17世纪之后，宗教战争打得很厉害，为了解决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才产生了比较严格的“国界”概念。

“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晚近产生的，即要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相同的历史，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定义一出现，就把之前所有的“帝国”都打倒了。以前没有现在说的法国、西班牙等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是帝国。“国界”的出现、“民族国家”的诞生，也影响到整个政治体制的概念，“民族国家”跟帝国是矛盾的。

问：“边界”和“民族国家”这些概念，是否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国际上的一些争议和纷争带来某些启发？比如，非洲地区的很多边界都是按照经纬线划分的，这样虽然便于在地图上进行标注，却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造成很多悲剧。

王赓武：对，今天很多问题的产生都跟这些概念有关。比如南斯拉夫这些区域就很惨，各种势力都在分，而且越分越小，就是在拿这个“民族国家”的定义来辨别，看谁有定“国界”的资格。

“主权”这个概念也是新的，尤其是在亚洲。是在西欧的殖民帝国解散以后，新兴民族国家成立了，于是才都拿“主权”、“国界”这些概念来用。亚洲现在的一些边界，其实是当年西方人定的，西方各国把他们的殖民地分得很清楚。

非洲现在乱，也是这样。有的“边界”就是一条直线，完全是人造的，根本没道理，就那样生生把一个民族、一家人分成两半。但是，大家都不敢动，谁动就会带来好多麻烦。

当然，如果大家都能和平地接受现有的界限，那也可以，非洲现在就在用这种方法。他们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eba，东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也是非洲联盟及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所在地——采访者注）开过一个会，说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如果硬要去争，就要不停地内战，于是大家共同决定，接受现在所有的界线，尽量想办法在既定界线内去建设各自的民族国家，各自发展。

但是，这样依然有很多问题，整个西非互相之间残杀得很厉害，好几个国家都是如此。现在又牵涉到宗教问题，比如基督教和回教之间的斗争，惨得不得了。东非地区还稍微好一点。

问：具体到亚洲，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其实也有很多边界是当初被殖民者所划定的。您又怎么看待亚洲这方面的现状？

王赓武：亚洲现在也面临很多问题，要尽量想办法解决，每个民族国家都要尽量把边界先定下来。比如中国，现在所有的边界几乎都定下来了，就差

跟印度的边界问题还没最终解决。

当然，东南亚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海上边界的问题。在大陆上，画条线大家都看得到，比较简单。但（边界问题在）海上怎么解决，这是大问题，而且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之前航海是自由的，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海上、沿海、海底的这些资源（被各个相关国家认为）也是自己的，对于界限在海上怎么划，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当然，如果大家讲理的话，海上边界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比如在马六甲海峡，马来西亚跟印尼之间的这条线不是现在划的，是当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划的，是英国跟荷兰之间为了避免矛盾，于1824年在伦敦签了一个《英荷条约》（亦称《伦敦条约》，新加坡有译为《盎格鲁—荷兰条约》的，此条约大体上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与印尼两国领土的范围，也决定了新加坡往后的命运——采访者注）而划的。据我所知，这是头一次真正的两方谈好，划一条线，而且它一直维持到现在——马来西亚建国，印尼建国，都维持这条线不动。因为两边都有陆地，中间划一条线，还比较容易解决领土争端。但如果两边没有陆地，或者一边有陆地一边没有，怎么办？南中国海问题就面临这样的局势。

问：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复制民族国家之前时期的情形，但在如何看待并解决南海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依然能从历史中获得一些启发？

王康武：南海问题一方面跟“边界”概念的出现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今天中国崛起，东南亚各国随之都要考虑如何跟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关。几千年

来，中国都是亚洲唯一的大强国，但是从18世纪末直到“二战”后，中国成为一个衰弱的国家。在那个时期，不管是欧美还是东南亚的国家，都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衰弱。但现在中国迅速崛起，跟东南亚的关系就变得格外重要。

中国这30余年的经济发展与崛起，和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从前没有所谓全球化的经济，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没有什么外贸。而中国最近30余年的发展，主要靠外贸、出口，除了市场之外，很多资源也要从外国运来，比如石油就基本靠海运。所以，海洋和全球贸易分不开。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海洋的问题，过去对中国可有可无的海洋问题，现在就变得十分重要。

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边界是大陆，三分之一沿海。在如今全球化的经济中，海运很重要，自己的海洋要保护好，变得日益困难。东海的问题比较简单，基本上只涉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而南中



国海就比较复杂，牵扯到跟东南亚国家的许多问题。

首先，东南亚地区本身的性质完全变了。从前是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宗教，几乎一切都不同，而且完全不合作、不来往，尤其是政治上没什么特别的来往，没有形成一个集团去对抗外来的势力。但是，现在不同了。东南亚十个新兴国家中，有两三个是相当强大的，印尼和越南都有相当的势力，泰国也不是个小国，缅甸难说一点。

这十个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 在北京论坛（2014）开幕式上，王赓武教授作题为“以史为鉴——文明无国界”的主题发言

也跟以前完全不同了。现在有一种新的契约感，建立了东盟，这个背景很有趣——最初的东盟是由5个反共国家建立的，而现在的东盟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契约——在这个复杂的、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每个小国是无法单独生存的，他们要在某些方面形成共同的声音才能生存。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跟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问题。

2002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倡导并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政策和双方特殊关系的建立非常有效，影响很大，但也引起了一些外国势力的注意，因此他们采取了一些方法，以图限制中国和东盟的特别关系。所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复杂。

南中国海其实只是一个借口，本身

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有关主权问题的争论，于是就有了这个借口，外界可以用这个来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问：最近四五年，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还处于一个重要背景之下，即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就您的观察和判断，东盟或者说东南亚国家整体上更偏向美国还是中国？对此，中国又该如何积极应对？

王赓武：就我所了解的，东南亚国家既不是要亲美，也不是要亲中国，他们希望东盟是完全独立的，跟相关国家一样的友好，从而得到最大的益处。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东盟会成为很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就是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位于中国、日本之南，澳大利亚、美国之西，处于这样一个中间位置，可能获取的好处会很多。所以，东

盟的成员国基本上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统一的东盟（根据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的《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亦称《第二巴厘宣言》，东盟将于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2007年11月20日，东盟领导人在新加坡签署《东盟宪章》并于次年12月15日正式生效——采访者注），能有一致的对外政策，以应对临近的所有势力。

但是，现在东盟想统一，并不简单，就是因为南海问题。怎样应对南中国海的问题，会影响东盟的前途。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如果能尽量避免在南中国海有任何冲突、纠纷，东盟就会无形中解决它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比较统一、独立的力量。但如果解决不好问题，使南中国海不安宁，东盟自己内部就很容易分裂。

现在，东盟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比如菲律宾太依赖美国，很多东盟国家不太赞同它的政策；中越关系非常微妙，越南要成为真正的东盟国家，不能跟中国有过于特殊的关系；缅甸本来跟中国很友好，而且相当独立，但现在各种势力又想借缅甸来干涉东南亚局势。

总之，就我所了解的所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都同意一点——即无论如何，东盟的前途在于统一，在于大家能有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其实，

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统一的东盟不是坏事，是好事。

史书与诸子之学的并重

问：在《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的演讲中，您也谈到，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以“经史结合”为核心。但是，西方的学术谱系中其实也有“经”的传统，比如《圣经》，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史学。两相比较，中国的经史传统与西方的主要有哪些区别？

王赓武：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中国对“经”的概念是实用的，这跟西方的《圣经》不同，后者是上帝赐予的，是超越性的，是你一定要服从的一套东西。这样的“经”，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经”的概念是很晚才产生的，唐代以后才慢慢定下来。此前，儒家、法家等不同流派各有不同的说法，相互之间有争论，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经”。

中国的“经”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后来佛家、儒家、道家相争的时候，佛家有了佛经，道家有道经，儒家也说，我们也有经啊。于是，原有的一套主张就渐渐地演变成一套经，成了大家的共识。

唐代以后，皇帝也认为这套东西还比较可靠，可以靠它来治国平天下，所以就利用儒家学说来治国，连考试制度都以儒家学说为主。到了宋朝以后，“理学”的概念就建立起来了，它把所有其他的流派如佛家、道家的好的因素都吸收进来，把儒家的学说和主张重新再解释一遍，于是形成新的理学。虽然元朝时没人说这些了，但明朝又把它拿出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变成正统，说这才是真正的“经”。

中国的“经”是后来形成的，而且

一定下来之后，经、史、子、集的次序也就定下来了，经第一、史第二。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是明清时形成的，明以前没有定下来，清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这些你不要看得那么严格。

中国的传统到底来自什么地方？一方面有思想的背景，另一方面有实践的记录。这个记录就是“史”。它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史”是所有的记录。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1738～1801）先生讲“六经皆史”，这很有道理。他是问六经从哪里而来。其实，六经就是谈怎样治国、平天下，都是从实践的经验来的。各类经书，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以及儒家学派对《易经》的点评，都是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记录。它们已经被使用了很多次，人们认为很灵，所以历史的经验就变成“经”了。只是那些非常顺从儒家思想的人，认为“经”是孔子的话，于是就把它神化了，认为要特别地尊敬；而“史”只是一些关于实践的问题而已，他们不愿意把“史”看得那么重要。这个分别，其实是宋朝才开始有的。

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中国有很多人开始注意章学诚先生的学说，也有很多人开始认为，不能把六经当成一种神圣的东西——它确实是中国传统里主要的一部分，但中国历史上也有“子”、有“史”、有“集”，这是一整套东西，“经”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经”跟“史”不能分得太严格，它们基本上是一套东西。

问：中国文化中的经史传统确实颇为独特，这套以经史为核心的传统学术和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又如何呢？当下

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能从这套传统文化里吸取什么样的资源？

王赓武：今天，中国的思想家确实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即是否应该改用其他具有全球性价值的经书来取代旧的经书。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具有伟大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是否应该干脆淘汰旧经。毕竟，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很难相信传统的“经”还能适用于现代社会。

中国人向来重“经”、“史”，却轻“诸子之学”，但现在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这是导致文化劣势的主要原因。西方使用科学即中国人的“诸子之学”，来加强对人类和社会的研究，这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示，现代文明的方法论可以是没有国界的。

当然，西方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区分开来，对两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损失。现在，有些中国学者正在研究如何利用中国的知识传统，将这两者统一起来。中国是非常强调秩序和国家治理的，所以史书是中华文明保持其独特性的核心要素。以现代一些的观点来看，史书与诸子之学的并重，就好比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总之，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更新“诸子之学”有助于创造繁荣，而研习史书则有助于保护文明。

如果用今天的话讲，我想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旧经不全，新经未成，子可开发，国有史集。也就是说，科学、技术都可以去学习去开发，而史和集，是国有的，是最基本的要素。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访谈经王赓武先生本人审定，并发表于2014年12月15日《经济观察报》。） C&C

中芬科学对话： 跨越半个地球的智慧分享

- 科学对话，走近纯净芬兰
- 分论坛一：空气治理的芬兰经验与中国问题
- 分论坛二：解码未来教育



纯洁的冰雪世界，湛蓝如洗的天空，为圣诞老人拉雪橇的麋鹿……这些可能是提起芬兰、提起北欧时，人们脑海中最先出现的意象。近年来，中芬经贸互补性强，两国在电信、造纸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生态环保、节能等领域正成为合作新亮点。教育、科技、文化、司法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作为两国的顶尖学府，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与北京大学均相信未来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只有不断创新，开阔思路，积极参与全球合作，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共创美好未来。在2014年11月26日举办的“中芬科学对话”活动上，两校学者围绕与国民生活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三点议题进行讨论，分享跨越半个地球的灵感与智慧

科学对话，走近纯净芬兰

文 韩琨

2014年11月26日，走进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的北大学生纷纷感到耳目一新，蓝色和白色成了这里的主色调，除了常设座椅外，白色地毯上还随意地摆放着十多个蓝色的懒人沙发。纯净、舒适的整体氛围来自主办者用心的创意设计，这是由芬兰政府和驻华使馆主办的“科学对话”的活动现场。中国与芬兰的多位学者就教育、大气及法治等社会热点展开了对话和交流。

新鲜气氛

有别于大多数论坛活动的单一背景板，几乎每一个走进活动大厅的人都会被充满异域风情的两位“美女”吸引住自己的目光——会场的主题背景板是两位身着芬兰传统服饰的女子头像，其中一位的头上没有头饰，却插着两支麋鹿的鹿角。再加上周边的蓝白布置，北欧特有的童话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

而观众席背后，却一下子从传统的童话风格跳转到了最摩登的数码屏幕。环境、法律、手机影像故事等若干板块，给了观众除了聆听论坛演讲、讨论之外，更加直观和丰富的感受渠道。一到展台展示时间，三三两两的北大学生迅速围到展台工作人员旁边，仔细观看演示，饶有兴致地与



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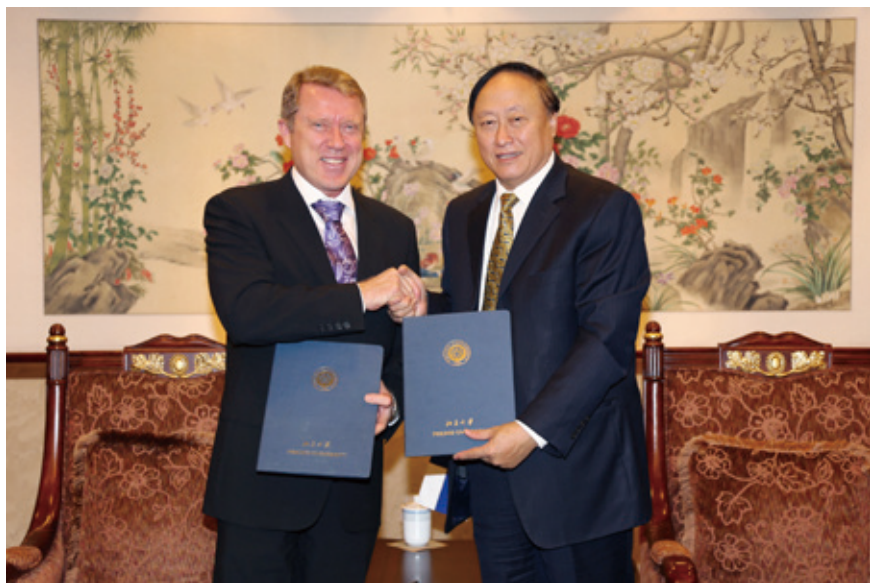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走进英杰交流中心之前，来来往往路过的学生们早就留意到了门前广场上停放的一辆大卡车，纷纷为它停下脚步，走近一探究竟。这不是一辆普通的卡车，通体白色的它被喷绘上了五彩缤纷的图案，从厢体外的阶梯走上去，你就进入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翻开书架上的一本书，它们都是或经典隽永或童趣盎然的儿童图书。原来，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还把“孩子们的流动图书馆”带到了北大。据悉，这是一个走访过30多所学校的“流动图书馆”。这个

旨在为下一代儿童提供更加新颖的阅读体验的项目已经在中国运行了3年。

感受到一个新鲜国度的风貌后，几位学生领取了芬兰特色纪念品，并在服务台前与工作人员交流起了留学芬兰的话题。可是，在北大举行的活动，主题怎么可能会少得了教育呢？

精彩对话

尽管只有500万人口——大约是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芬兰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



◆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与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尤卡·克拉签署北大-赫尔辛基合作补充协议

历次测试排名中都很靠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贾积有表示，中国确有必要向芬兰的教育“取经”。赫尔辛基大学教育学教授汉内莱·涅米说，老师不仅仅是学习科目的专业人士，也必须是自学方面的专家。除了激励学生，老师的主要任务还包括找出学生们学习上的问题，与他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据她介绍，芬兰教学的特点是平等、重视终身学习以及教育体系中的灵活性，“学生即便中途离开，也总有机会可以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在最近两年饱受雾霾困扰的北京召开这样一场对话，芬兰纯净的空气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谈到中国与芬兰两国有哪些需要互相学习的地方，贾积有没有继续谈论他的专业领域——教育，而是幽默地表示“当然是芬兰纯净的空气”，引来一片会心的笑声。

事实上，关于大气，中国也正在为改善环境而努力。赫尔辛基大学作为发起方之一，2013年启动了一项泛欧亚实验，旨在推动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也许正是因为对芬兰纯净空气的向往，论坛对话间歇的展示时间，学生们对赫尔辛基大学大气科学研究生及博士生课程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向工作人员咨询。

与会的中芬两国学者还就两国特色的法治进行了交流与对话。赫尔辛基大学成立了芬兰中国法与中国法律文化中心，旨在促进有关中国法律的研究。

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诺西欧表示，当芬兰1995年加入欧盟时，芬兰律师有许多东西需要从欧盟学习，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芬兰法律工作者的视角都集中在欧洲。如今芬兰学者对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兴趣在增长，希望芬兰更多地与中

国同行交流。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溯表示，芬兰的贪腐程度全世界最低，囚犯数量也全球最少，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可以提供一些经验。

深入合作

“科学对话”活动实际上是芬兰政府与芬兰驻华大使馆主办的“纯净芬兰”系列活动之一，该系列活动自今年9月在北京拉开序幕，旨在向中国展示芬兰社会、经济、教育、投资、创新、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活动开展之前，北京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两校将在法律、环境科学、医学领域展开深入的合作。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将是北京大学与芬兰高校交流合作的新契机。朱善璐说，北京大学一直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作为学校的核心工作之一，并珍视与国外优秀高校的伙伴关系。近年来，北京大学和芬兰高等教育界与政府保持着活跃的合作。赫尔辛基大学、坦佩雷大学都是北大密切的伙伴。芬兰优秀的教育体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已经与芬兰多个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同时，北京大学每年都与赫尔辛基大学进行学生和学者交换，促进双方的学术交流。一些毕业于芬兰大学的优秀研究者，也加入北京大学承担教学与科研任务，为北大带来了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理念。C&C

分论坛一： 空气治理的芬兰经验与中国问题

文 胡万亨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与此相关的空气质量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中国，由空气污染引起的症状每年导致 127 万人死亡，人均寿命减少 1~5 年；而在欧洲，人均寿命也因空气污染减少 8 个月。因此，寻找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的机制至关重要。“科学对话”活动中，赫尔辛基大学的著名气候专家马库·顾马拉（Markku Kulmala）教授、北京大学胡敏教授、南京大学丁爱军教授和南开大学毛洪钧教授做客“科学对话”，就改善空气质量、森林对大气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赫尔辛基大学强尼·库杨素（Joni Kujansuu）博士主持。

首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工程学院的胡敏教授对中国及北京的空气质量状况进行了介绍。她指出，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呈现出污染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严重、污染物浓度累积迅速、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等特点，主要的污染区域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最为发达，同时空气污染也最严重。其中，京津冀最为严重，PM2.5 和 O₃ 常常伴随产生。随后，胡教授介绍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政策咨询等方面的工作。作为国内最早开设环境教育相关项目的高校之一，北大于 1972 年开设环境化学专业，1982 年成立环境



科学中心，2007 年成立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院目前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及研究平台，在燕园、昌平和坝上三个地区设立了空气监测站。北京大学关于大城市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支持，相关成果发表在 Science、PNAS 等顶级刊物上。该研究指出，在相同硫酸浓度下，北京新粒子生成速率较高，说明有机物对成核影响较其他环境更为显著。最后，胡教授期待两校未来在环境科学领域，如雾霾的二次形成、对健康的影响等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接着，国务院空气治理咨询专家、南开大学毛红钧教授介绍了“PM 2.3 模型、预警、监控、治理一体化开放互联网平台总体方案”。该方案由中组部支持和组织、由 70 余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PM2.5 科研实验专家小组”提出，旨在解决我国在 PM2.5 防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排放底数不清”、“形成机理不明”和“系统治理不足”的三大主要问题。专家小组在京津冀地区的工作发现，受太行山脉地形影响，北京南方的污染主要来自西南方、南方的 3 个污染带的跨界输送；燃煤是冬季污染主要来

源，扬尘是四季污染之害，机动车尾气排放是添污祸首，而烟气则是臭氧形成的祸根。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包括：对污染移动源如汽车尾气进行 GIS 跟踪、使用替代汽油、重污染天气削峰减频、提前预警与处置、精细化网格调控等。

第三位发言的是赫尔辛基大学马库·顾马拉教授。他指出，当前我们面临许多全球性的大挑战，比如空气污染、气候变暖、地震频发、食物短缺、能源危机等，其中很多都是相互联系的。空气污染物成分复杂，每年有 1500 名芬兰人因此而死亡。解决空气问题的路径，在于从深入理解、全面分析到实际行动，建立一个涉及污染排放、气象改变、浓度测量、健康影响、决策制定、产业结构等各环节的综合体系。同时，他呼吁两校建立一个空气质量联合研究与创新中心，在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知识转化和产业发展方面共同努力。

最后，丁爱军教授介绍了南京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合作项目“地球系统区域过程综合观测试验基地”（Station for Observing Regional Processes of the Earth System, SOPRES）。该项目旨在观测空气污染-气候相互作用、大气-生态系统相互作用、水循环和地表物理过程，并在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 SMEAR（Station For measuring Forest Ecosystem-Atmosphere Relations）监测点。观测表明，空气污染会影响生态系统，并造成气象状况的改变。观测的主要困难，则在于空气污染物的流动。丁教授认为，SMAER 监测可以为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持，先进仪器的快速发展为空气污染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现在最需要的是更多跨学科和国际性的合作。C&C

分论坛二：解码未来教育

艾新雅

作 为两个国家教育人才培养的重镇，赫尔辛基大学与北京大学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本次讨论由赫尔辛基大学亚瑞·穆提斯尔塔（Jari Multisilta）教授和北大教育学院的贾积有教授联合主持。来自赫尔辛基大学汉尼勒·涅米（Hannele Niemi）教授、奥利·韦斯特瑞宁（Olli Vesterinen）博士、北京大学郭文革教授和 Ruvio 娱乐公司学习开发部萨娜·卢坎德（Sanna Lukander）主任参与本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会上，两所大学的教授就当今教育与未来走向问题，针对考试、教师角色、现代科技、教学游戏等具体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时代： 信息流时代的未来教育

未来的教育必然生长和发展在一个网络全面覆盖资源超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因而为了更好的做到传统教育与未来教育的顺利衔接，考量未来教育问题势在必行。贾积有教授首先介绍了北京大学正在发展的线上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慕课”（MOOC）。北大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进行知识分享的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电子线路》、《民俗学》、《世界文化地理》等课程上线，北大的教学资源被更多人使用，提高了高级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赫尔辛基大学几位

教授表达了对北大“慕课”放手给学生老师自主运营维护后取得的丰硕成果的赞赏。在这个论点上，几位达成一致的看法，即：网络共享教育资源是一个必然趋势，如何借助网络发展未来教育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重大论题。赫尔辛基在网络课程方面体系非常完善，运营时间也比较悠久。两校可在未来就这一领域展开合作。

激发： 参与感是最重要的未来主题

在考量信息科技未来教育也必将更加注重受众的个性，更加具有人性化的需求。老师应该促使学生更好的接触新科技来提高学习效率，以促使课堂内容超越课堂，更大限度的扩展学生的眼界。在这一点上，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在课堂开始时玩游戏，让大家集中注意力。后期的游戏设计也和教学内容有关。许多人认为课堂游戏是给小学生教学的方式，但实际上，在赫尔辛基大学的理念中，对于大学生，成人的课堂也非常应该注意游戏的设置，让课堂更加丰富和易于掌握。

与赫尔辛基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大学几乎只在语言学习课堂上设置游戏，这种游戏环节更多存在于小学生的教育上。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低龄的学生才会需要游戏去集中注意力，但实际上这是每个年龄段都十分需要的教学方式。中

国教育者在这方面做的并不足，这种游戏教学的观念受众并不广泛。

“当我们在游戏时，思维总是活跃的，这种愉悦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发现当天课程的主题和深刻含义。在游戏中我们需要坚持。这种精神的培养也是教学的目标之一，因为游戏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也是十分重要的。”奥利博士说到。

最后，郭教授又补充道：老师应该在课余也提供更好的技术和学习环境资料，这是保持学生持续积极性的必要手段。总之，几位教授的发言让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注重参与感的互动实现，是一种课堂内外皆备的学习兴趣引发下的全民学习，资源互通。

破立： 突破桎梏的未来展望

当谈到考试的话题时，汉尼勒教授将现今的考试称为“table thing”这只是一种可以培养的片面技能，认为这种并不立体的测试方式将会使大多数参与者产生对自己的误会，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评价。确实，测试结果好者并不意味着掌握知识的水平就高，成绩差者则会因此失去摄取知识的兴趣和信心。萨娜主任说：“考试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很多人坐在桌前考试的这种方式是需要被淘汰的。”这种方式能让家长老师已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她认为未来的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这样一种评价方式，考试是必须要被改革的重要环节。

18世纪英国出现最早的现代考试。讨论会并不是强调讨论狭义的学校教育，所有参与的学者都是泛教育论的忠实拥护者。当今社会中，考试已成为上



至政府、下至各单位学校等的工具，用以选拔人才。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教育的发展让学习和人才的发展方向更加的多元化，因此一种考试的局限方式并不能适应这种情况的发展。网上的测验和更加多元化的测试形式应该被更广泛的发展。郭文革教授最后强调：“如果我们过于相信现行的这种考试机制，我们将会丧失学到真知的能力。”关于未来教育，与考试相同重要的话题也被提上论坛——教师角色转换。在这一点上，赫尔辛基大学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在教学中师生间形成的良好互动让这所大学一直享誉世界。奥利博士提出他一直倡导的教育观点：老师教育的最大乐趣应该来自于向学生学习。老师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应该来自于长期像学生学习的积累和探索。

郭文革教授则将中国教育在这一点上存在的不足举出与大家探讨。这是一种教育转型下的困惑。重点学校的老师已经开始转变方式，使用框架式引

导的方式来教授，但是由于学生习惯长期被动式的填鸭学习，导致新生入校伊始对这种教育方式产生极大的反感和不满。这种长期养成的惰性不利于教育向未来化发展。贾积有教授也对此发表看法。因为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当今社会高等教育节盲目倡导自由讨论式学习的现状下，北大更应该承担起更多理性思考。因为在中国教育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所有的学生都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和学习经历，这样的自助讨论式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效率的。因而他表示，即使是未来教育，也应该有教授引导的课堂，这样才是一个全面合理的未来课堂。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未来教育更是如此。从古时《师说》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到如今“引导者、领路人、协助者”角色的转化。真正发掘未来教育内核，更快更好适应走向未来教育模式，北大将携手赫尔辛基大学，一起向前走。C&C

打造知识经济的强劲引擎

- **转型与挑战：全球背景下的高等教育**
访金子元久教授与柯伟林教授
- **引领创新驱动，推动经济转型**
北大-斯坦福论坛现场印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不断推进，研究型大学将成为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引擎。2014年10月20—21日，主题为“大学与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北大-斯坦福论坛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来自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大学对创新的作用及大学创新的影响因素”、“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排名与创新性教学及研究产出的测量”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课程设置”四个论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转型与挑战：全球背景下的高等教育

访金子元久教授与柯伟林教授

文 张优良 崔景颐 张金金

过去2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这其中不仅包括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学者，也包括那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汉学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汹涌的国际化浪潮面前，崛起的中国必将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如何从一个比较的、全球的视野出发，看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借着北大-斯坦福论坛的机会，记者采访了日本筑波大学金子元久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

国际化：一种教育价值的转变

作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理论派教育学者代表，金子元久教授通过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机制与中国作比对，分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及其现状，并指出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院校转型问题。

现在许多高校都认为提高国际化水平对高校的发展很重要，都希望提高其国际化水平，但究竟什么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有较多争议，也存在多种多样的高校国际化水平衡量体系。金子元久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包括但不限于学生不同国家间流动的数量、掌握外语的学生数量、高等教育机构数等硬性指标，更重要的是教育价值的改变，这需要教师和学生随之做出相应的革新，不囿于传统的观念，而能认识到国际化所能带来的深远意义。例如，根据日本一项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毕业生中的调查，只有10%的大学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英语，因此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掌握英语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必要的。但这并不代表“外语无用”，因为外语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其影响可能不限于求职、就业，还体现在对人生轨迹的影响。如学生到英美等国家留学的经历或许可以改变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这才

是高等教育能够提供和所应该提供的东西，也是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

由此，他提出，一方面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建立区域平台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应当转变学生观念，高校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交换项目。从长远发展看，提升国际化水平对高校院校发展、教学创新、学生成长都非常有益。

留学大潮：机遇与改革

金子元久教授积极支持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因为除了经济预期收益的回报外，学术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因素。出国留学可以拓展研究的视角，一个学生在一国跟着某位教授学习，其研究的视角或多或少会受到限制，而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恰恰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中国学生发表的国际论文日益增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有许多学生选择去美国等国家留学，拓展了研究视野，通过交流完善自己的研究，也在留学的过程中更熟悉国际学术环境和国际规则，并努力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这种留学交流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的网络关系，而这种合作网对于高校国际化也是十分重要的。



◆ 资深日本高等教育研究学者金子元久教授在论坛上发言

“大学是一个国家能够强劲发展的有力支撑，许多事关国家发展的杰出思想都是在大学孕育而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培养出的许多杰出人才为今日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今，在谈到国际化时，学者们更多地是在谈论对一种“趋势”的研究。而金子元久教授认为，提升教学质量，尤其是重视本科生教学质量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系，是更为迫切的。大学学术研究的质量固然有很多评价指标和不同的标准，但对于与学生更息息相关的教学而言，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很少的。现在有的研究正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但还不是很成功，人们说得更多的是要求先进、前沿的学者进入研究生院，但是本科生的国际化教育却甚少提及，缺乏清晰的阐释。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困难而重要的主题，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发展机遇；对于北京的高校来说，促进本科生的国际化更为关键。

21世纪高等教育：中国的时代？

作为一名现代中国历史学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关门弟子，柯伟林教授提出，从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视角来看，如果说欧洲大学引领了19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大学引领了20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那么作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发展速度都是最

快的中国，或许可以引领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

柯伟林教授指出，纵观中国高等教育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国际学生流动方面，中国较上个世纪已有显著提高。近现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输出国，无论是历史上政府派遣留学生，还是个人自费出国留学，主体都是“走出去”。但这一态势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扭转。今日的中国已重新以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身份立于国际舞台，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来中国求学、工作和定居。

中国的大学也积极主动地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外大学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如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都是这一交流机制深化的产物。此外，2013、2014年先后启动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和“燕京学堂”计划更是开启了国际学生交流的新篇章，也是中国一流大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响应和探索。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际环境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具有引领世界的潜力毋庸置疑。中国高



◆ 知名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

等教育发展所需的基石已经具备，关键是如何调配，使其合理优化，从而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

去行政化：大学学术自治的呼唤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但若要在21世纪引领世界大学的发展，其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加强高校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柯伟林教授认为，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一个国家各项事务的集权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某些领域的发展，这一点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的极为明显。高度的集权化限制了高校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样的氛围必然难以萌生自由之思想，这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是不利的。

柯伟林教授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角度分析后得出结论，当前高校集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而在于中国政府怎样管理大学，特别是怎样规划大学的内部治理。大学应当是享有一定程度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自治组织，但中国的高校往往有许多限制，即便是

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仍然具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政府对大学干预较多，用管理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自治，这是很令人遗憾的。高校的去行政化与其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息息相关，柯伟林教授期望中国政府可以尽快对此进行调整，增强大学的学术自治水平，激发大学的活力。 **C&C**

背景链接

金子元久，目前就职于日本筑波大学，曾任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大学综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日本中央教育委员会，科学理事会等多所政府机构成员。他是一位在国际和日本高等教育研究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经济学和国际比较教育。

柯伟林 (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 T. M. Chang 中国研究讲席教授，哈佛商学院斯潘格勒家族讲席教授，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学会会员，2006-2013 年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担任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他的研究关注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商业、经济和政治发展，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商业研究和中美欧三地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等。

引领创新驱动，推动经济转型

北大-斯坦福论坛现场印象

北京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的生成、传播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我们新世界经济之中的电力，大学就可以认为是发电机。为探讨大学在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专项创新驱动增长方式中的作用，10月20日上午，北大-斯坦福论坛在坐落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朗润园的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拉开帷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闵维方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本届论坛具有层次高、范围广、研讨话题深入而广泛等特点。会议嘉宾涵盖了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瑞典、芬兰、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近百位专家学者，许多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作为北大与斯坦福大学两校战略伙伴关系的延伸活动，论坛也得到了斯坦福方面的大力支持，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约翰·艾切曼第

创新：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

北大-斯坦福论坛的首场学术报告围绕“大学对创新的作用及大学创新的影响因素”这一主题展开。报告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闵维方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陈东敏教授从大学职能的



北大-斯坦福论坛第一场讨论现场

(John Etchemendy) 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他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良好契合了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学建设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他希望各国高等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完善，培养出更多引领世界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为世界的知识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作为会议东道主，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院士也对与会的各位学者

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近年来，北大在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创立了创新中心，并同时呼吁，研究型大学应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学生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从哲学的视角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同时学校也将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开展更多的国际化学习交流，以激发灵感、锻炼创新力，从而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更具竞争力和多元、宽广的视野。

角度出发提出，现在的研究型大学在承担传统的培养人才和传播科研成果的职能外，还肩负着直接影响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发展的使命，帮助政府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大学对国家创新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产学研结合、专利申请以及创

办衍生企业等途径实现。中国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正在经历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由制造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挑战。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但要在创新方面引领世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

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在国家经济转型中特别是在加速国家创新发展方面承担起重要责任。与此同时，经济转型也为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研究型大学通过在校外建立政府、产业、学校间合作关系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对大学内部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新的影响。在主题演讲中，陈东敏教授还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案例介绍了中国研究型大学创新的相关情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满超教授发表了题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主题演讲。曾满超教授回顾了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体和组织的特征，以及影响创新型系统（包括研究型大学在内）效益的因素。基于影响大学创新能力的个体、机构以及系统层面的因素，曾满超教授就创新性对美国两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进行了详细的案例剖析。他指出，大学在创新方面具有两面性，大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一般不会挑战根

本文化和根本的任务；另一方面，大学对区域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大学不是孤立的机构，并不是单纯培养人才，还应与合作伙伴建立联系，推动成果转化的转化。研究型大学应立足区域经济，对当地的产业及经济运作方式进行研究，促进大学的教育创新。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硅谷模式并不适用于任何地区，要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 Scott Stern 教授的主题演讲“超越创意工厂”探讨了大学在塑造创新驱动的企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中的作用。Stern 教授指出，大学在塑造创新驱动的企业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经常被低估。大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通过发展新理念和技术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上，还体现在其基于创新理念创建新公司的企业能力上。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大学创新依赖于其所处的体系。Stern 教授提出的一个新框架展示了大学的上述能力，他基于定

量分析和对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项目（MIT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Acceleration Program）的案例研究，评价了大学在塑造创新驱动的企业生态系统的作用。大学为所在区域培养人才，参与不同的发展项目，通过机构和体制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教授以浙江大学为例，回应了 Stern 教授对大学对创新作用的观点。林建华教授指出，大学创新能力的研究文献大多只聚焦于大学的技术孵化能力，但这是对大学使命和职责的不恰当理解。过去大学是比较孤立的机构，与社会脱离。在无限开放式创新的大趋势下，大学通过知识流、信息流和人才流为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提供了知识基础。大学通过四种模式的互动嵌入到了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中：知识孵化、创新咨询、创新联盟、项目定位。浙江大学通过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和大学内部的创新平台，已经实现了全面深入的与经济系统的合作性创新。过去 20 多年，在应对创新型经济的过程中，浙江大学已经在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创新服务领域有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工程科学、生命科学、艺术学科等学科与国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下午，北大 - 斯坦福论坛第二场报告会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会议由北大斯坦福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 Jean Oi 教授主持。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均参与其中，这在高校文化、学生流动、教师发展等方面均有体现。国际化对高校而言意味着什么？学



◆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教授在发言中，介绍浙江大学如何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和大学内部创新平台的搭建，实现与经济系统的合作性创新



生流动对输入国和输出国分别有什么影响？世界各国如何应对国际化带来的挑战？围绕“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主题，来自美国、日本、印度、瑞典等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不仅存在竞争，也在进行相互合作。斯坦福大学 Martin Camoy 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是全球化的。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之间在科技层面的合作关系主要是由学生流动产生的：学习理工专业的学生受到本国的公共资助，从创新水平较低的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创新中心接受训练，这是一种无形中的跨国合作。学生学成后返归本国，促进本国科技创新并参与全球竞争，这又彰显出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在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学生流动背景下，“金砖四国”等国家一方面看到了本国发展创新文化的潜力，另一方面也面

临着学生移民发达国家所造成的人才外流困境。因此，这些国家提出要建立本国的创新中心。Camoy 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这些国家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建立创新中心意味着进行高额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甚至是改变经济政治文化。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金砖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的。

筑波大学高校研究中心金子元久教授的主题演讲以日本高校面临的挑战为例，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院校转型问题。金子元久教授认为，在全球学生流动的进程中，有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学生需求、高等教育机构供给、学生交换和交流平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的学生流动却发展缓慢：入境学生总数较少，出境学生自 2000 年之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金

子元久教授认为，日本国际学生流动进展缓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日本本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大招生，减少了学生出国留学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回报下降等原因，日本学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留学需求。如何逃离国际学生流动停滞甚至下降的陷阱呢？金子元久教授指出，这一方面要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另一方面应当转变学生观念。从长远发展看，提升国际化水平对日本的高校教学创新、院校发展、学生成长都非常有益。因此，日本学术界应当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长远影响。

弗吉尼亚大学 Sarah Turner 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国际化。在过去 30 年里，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留学数量急剧增长；在过去 10 年里，赴美接受本科教育的留学生数量

也大幅增长。学生流入趋势反映了美国与流出国家和地区之间在高校选择、经济环境和毕业生就业机会等因素的差异。Turner 教授纵向跟踪了这些因素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对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产生影响的差异。Turner 教授发现,学生选择到美国留学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学生在本国无法获得想要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关于劳动力价值市场,即赴美留学的学生可能更容易在美国找到工作。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的改变、学费成本的降低、研究生获得奖学金机会的增加都提高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可能性。Turner 教授还指出,国际学生赴美留学对美国高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主题演讲后,与会专家围绕大学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做贡献、大学在经济社会创新中的角色身份,以及大学在创新中的效率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学排名与创新性教学

北大-斯坦福论坛第三场报告会 围

绕“大学排名与创新性教学与研究产出的测量”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如何整体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和发展变革,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挑战。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 Isak Froumin 教授以俄罗斯为例,阐述了俄罗斯政府在促进大学创新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努力,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Froumin 教授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缓慢,大学往往无法胜任在以创新变革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任务,因而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逐渐从适当引导转为使用强力推动手段将大学纳入创新发展的深刻变革之中。

Froumin 教授认为,大学应进一步深入了解其发展的内在文化动力,改善自身管理模式,提升领导力并保证内部改革创新结果的可持续性;政府则应以动态化指标体系为依据,为顶尖大学提供特别贷款,推动大学的改革和发展。2013 年开始的一项旨在增强俄罗斯高校国际竞争力的项目,使俄罗斯 15 所高校加入到全球大学排名竞争的行列。

Froumin 教授提出,应当将入学学生的总体质量作为衡量大学创造性教学和创新变革成果的基本指标。

目前,世界各地针对各类高校的排行榜层出不穷,由于大学排行发布者的不同立场、身份和考察范围等因素,至今没有一个客观、统一的标准或指标来对大学进行评估和排名。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2003 年第一份多指标全球大学学术排行榜——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 的公布催生了后续 10 余个大学排行榜的诞生。ARWU 研究团队主要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教授总结了主要几个全球大学排行的相关性,介绍了 ARWU 的测算方法和指标,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基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刘念才教授还分析了亚洲大学在全球范围大学中的表现。刘念才教授认为,不同的大学排行体现了不同的测量维度,从而导致了各大学“表现”的差异,因而大学排行机构应当进一步完善排行体系,其用户则应审慎处理排名结果。刘念才教授梳理了 ARWU 的具体指标,对大学排行在对大学定位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表达了对大学排行在测量指标、考察范围方面进行多样化处理的期望。

学术商业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势不可挡的趋势。瑞典隆德大学 Olof Ejerme 教授详细阐述了瑞典的学术商业化趋势,对不同的学术商业化模式和类型进行了系统总结。瑞典将高校系统的教学科研与研究者参与商业活动结合起来,高校科研成果要为产业发展所用,并与商业公司产生互动。Ejerme 教授收集并分析了从 1995 年到 2011 年超过五万人次学者的商业化信息,将专利、个人商业资金收入、非学术工作和学术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 Isak Froumin 教授以俄罗斯为例,阐述了俄罗斯政府在促进大学创新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努力

创业等作为衡量学术商业化的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回归分析, Ejerme 教授对瑞典科研人员的商业化情况和活跃程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发现年龄、职称等成为影响该国高校科研人员学术商业化行为的重要因素。

针对全球大学排行系统和机制, 印度国家教育规划管理大学 Jandhyala B. G. Tilak 教授以印度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Tilak 教授回顾了高等教育立法改革措施和各项议案, 指出了印度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核心。他认为, 大学的国际排行是一把“双刃剑”, 而对于印度来说, 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有效敦促印度高校提升教育质量并采取积极措施; 另一方面催生了“精英大学建设计划”等各项法案, 通过吸引国际教师、留学生和海外投资, 引入竞争机制, 降低本国教育成本, 减少对公共资源的依赖, 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印度建立世界级大学, 提高印度高校在全球大学排行中的排名。

课程与创新性人才培养

北大-斯坦福论坛第四场学术报告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课程设置”展开。随着时代的发展, 全球高校需要重新思考办学理念和方法。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教授介绍了新成立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实行的全新的“四位一体”办学理念。他希望通过“学科教育”、“通识教育”、“研究与实习教育”和“个人和社区教育”的“四位一体”办学模式, 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乐于为社会奉献的高水平人才。

21 世纪亚洲各高校越来越注重通识教育, 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教授在论坛上介绍了新成立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实行的全新的“四位一体”办学理念

一些大学纷纷引入通识教育, 取代了一些具有较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项目。来自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创始人 Pericles Lewis 教授通过深入分析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特色, 为亚洲高校构建通识教育体系提出了建议。Lewis 教授认为, 美国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允许学生广泛学习, 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主动学习意识的同时使学生获得了很强的社区意识。Lewis 教授还指出了通识教育目前可能的不足, 如难以实现教育公平、学生忽视对自身薄弱学科的弥补、教师轻视教学质量的提升等。最后, Lewis 教授介绍了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Yale-NUS College) 的解决办法, 如拓展学生对不同学科的了解、注重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交流、鼓励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等。

俄罗斯高校在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同样遇到了挑战。俄罗斯学术事务副主席 Timothy Edward O' Connor 教授以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工艺技术大学 (MISiS) 为例, 介绍了俄罗斯高校在

实行高等通识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O' Connor 教授指出, 行政化、预算有限、激励力量不足等因素制约了通识教育在俄罗斯高校的普及。O' Connor 教授认为, 文化交流和制度变革可以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为此, 俄罗斯高校应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自省意识, 同时鼓励国际交流, 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

近年来, 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理工科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如何? 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理工科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理科学生与其他学生群体的创新能力是否存在差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朱红副教授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所在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该课题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学生创新能力与学习成绩正相关, 与个人能力无关; 学生成就感与生源地类型、父亲职业水平相关, 与学科无关; 学生专业选择与学习成绩相关; 学生的能力与实践课程的开展、选课自由度正相关。C&C

友谊、信任与创新： “芬兰北大”的国际化

专访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尤卡·克拉

文 胡万亨

创 建于1640年的赫尔辛基大学是芬兰最高学府，被中国朋友们誉为“芬兰的北大”。11月26日，赫尔辛基大学校长尤卡·克拉（Jukka Kola）率代表团造访燕园，与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了“纯净芬兰——科学对话”活动，并签署了北大—赫尔辛基合作补充协议。在其去年8月正式就任校长的演讲中，尤卡·克拉尤其强调将大力推动国际化，此次访问北大便是其重要举措之一。在近40分钟的专访中，这位赫尔辛基大学第137任校长分享了他对于一流大学国际化的思考和洞见。

内涵：“不仅仅是目标，更是创造新思想的手段”

推进一所大学的国际化通常意味着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和学者，这同样也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发展重心，例如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建立交换生项目。那么，“国际化”仅仅指更多的海外人才数量吗？如何理解它的内涵？它有哪些重要的方面呢？

尤卡·克拉校长认为，海外人才的数量确实是国际化的重要方面，没有国际上的学生和学者，当然谈不上国际化。但这只是一部分，交流必须是双向的，因此赫尔辛基大学也非常鼓励芬兰的学生走出国门，去中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学校学习。更重要的是，国际化不仅仅应当被视为一个目标，它更是一种引入不同的思维模式、创造新思想的手段。芬兰仅有500多万人口，数量并不多。即使芬兰师生的素质非常高，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倾向于采用相同的方式，思路不够开阔。而海外学生、学者的到来可以带来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想法，各种想法结合在一起便能产生新思路、做出新东西。比如，这次“科学对话”中的法治、洁净空气、未来教育等主题是国际上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但芬、中两国的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对话和碰撞使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更加深刻。我们并不需要对这些思维方式分出高下，重要的是这些思维方式是多元的，囿于一隅很难做出新的、好的发现。正如一支足球队需要到国际赛场上和不同风格的对手交流，才会真正具有竞争力。

同时，人才的国际流动也是发展社会关系、建立社交网络的方式。如果既不走出国门，也没有海外同行过来，那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联系。即使现在可以通过Email、Skype等进行一些交流，但这只是第二步——首先应该走出去，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彼此了解、相互学习，建立友谊。

机遇：“政府希望大学更加国际化，芬兰学生也欢迎海外同学”

“实际上，国际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方面的障碍，这是政府或者教育部的政策，他们也希望芬兰的大学变得更加国际化。对于大学来说，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当问及赫尔辛基大学的国际化策略是否面临一些行政上的阻力时，尤卡·克拉校长如是回答。

正如《印证芬兰：事实与分析》一书所指出的，“国际化也将是芬兰教育系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芬兰的外籍研究人员和学生数量仍然很低……着眼与未来发展，同时面对芬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芬兰教育系统的关键在于芬兰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人才，以充实芬兰的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芬兰政府也十分重视大学的国际化。不过，尤卡·克拉校长也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和学者，还是得需要先利用好现有的资源。面对有限的资源，当大学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国际化当中的时候，只能把其他方面放在相对较低的投入水平上。赫大和北大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科学、医学等四个领域，所以也会在大学的预算里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当然这些领域的人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寻找经



“近期，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优秀的国际人才。赫尔辛基大学已经吸引了芬兰最好的学生，但是要保持顶尖水平我们同样需要国外最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摘自尤卡·克拉的校长就职演说

费，比如欧盟或者中国等。

“即便没有额外的一些资源，你也得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国际化。或许其他方面也很重要，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方面你必须大力投资，使其强有力地开始运转起来。如果只投放一点儿的资源，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你必须以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投资，使其接续下去，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国际化就可以自成一体进行运作了”，在尤卡·克拉校长的理解中，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果一开始招募了足够的国际学者，而他们也都会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可以从其他的地方获取研究经费和寻求合作，这可以使得一所大学的国际化得到持续运转和加强。对学生来说也是同样的，学生们相互学习、共同获得新知识，那么在国际和国内会变得更有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当你有了多元的新视角之后，你就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打开了一扇门”。

不仅是芬兰政府，赫尔辛基大学的同学们也非常欢迎国际学生。为了吸引国际学生，赫大在英语教学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源，而这些项目也对芬兰学生开放，并且保持一定比例的本国和外国学生。“如果这些项目只对国际学生开放，那么这种做法将是愚蠢的，因为国际学生来到芬兰不仅是为了

学习，也是为了和芬兰学生们交朋友”。芬兰学生也非常渴望变得国际化，而这些项目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机会。

挑战：跨越语言障碍、设计特色课程，让人们“动起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虽然有政策支持和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尤卡·克拉校长也道出了芬兰的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难。人们总是倾向于守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家庭因素而不愿意漂洋过海。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鼓励优秀人才“动起来”。至少要向外迈出第一步，然后才有可能在芬兰学习、工作更久。目前芬兰学校的很多交换项目很多还是面向欧洲国家的，其他地区的学生人数不是很多。此外，赫尔辛基的留学生数目虽然不少，但是芬兰学生去非欧洲国家的学生并不太多。

这当中主要的困难在于语言。芬兰的官方语言是芬兰语和瑞典语，而没有英语。赫尔辛基大学有广泛的英语教学的课程，但是在一些行政、日常服务的事务上通常并不是英语。同样，要融入芬兰社会就必须多多少少学会一些当地的语言，

这对于芬兰的国际学者和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对于留学海外的芬兰学生也是一样。如果不懂芬兰语或瑞典语，就很容易被孤立在教学科研领域之外。留学生们通常在毕业之后就离开了，而海外研究者也很难待很长的时间。如何更好地进行语言教学，对赫尔辛基大学也是一种挑战。赫大一方面开设了一些芬兰语和瑞典语教学项目，另一方面也会创造一些机会如联谊等，来增进海外师生与芬兰师生的语言交流。但这些都完全是资源性质的学习，人们并不一定会感兴趣。对于一些芬兰人来说，用英语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一个会上只有一个国际学生而其他 20 个都是芬兰学生，一直说英语似乎也有些不合时宜。“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但这需要时间。毕竟英语使用广泛，对于国际上许多人来说都是通用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公平的”，尤卡·克拉校长说。

“你可以改变教学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失去文化个性”，在认同英语作为桥梁语言的作用的同时，尤卡·克拉校长非常强调保持国际化中的文化特色和学科优势。如何在全球教育市场中凸显自身特色、吸引海外学生也是大学国际化过程中的一大挑战。赫尔辛基大学目前开设了 35 个全英文的两年制国际硕士项目，并且每年都会评估这些项目的运作情况，比如通过申请者的人数看哪些项目更受欢迎，然后针对那些不太受欢迎的项目做一些改进并设计一些新项目。这些项目中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很受欢迎，有很多的申请者可供挑选，但是一些基础的自然科学就不太受欢迎——虽然它们也很有趣，但也许是因为这些课程在全世界也都差不多，所以申请者对于芬兰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如果在课程当中加上一些特别的元素，精心设计课程主题，针对学生量身打造，那么将会在全球教育市场中占有先机。

争议：“市场逻辑下，国际学生还应当免学费吗？”

芬兰对教育高度重视，从小学到大学的公共教育经费几乎均由政府提供，国际学生也不需要缴纳任何学费。在许多人看来，这对芬兰的大学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十分有利，但在尤卡·克拉校长的理解中，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市场逻辑下，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免费的教育可能意味着质量得不到保证。

“如果国际学生真的来到芬兰，他们会认识到这里的教育质量很高。但是如果没有来过，人们很可能在教育市场中做出这样的比较：在英美国家需要每年支付数千英镑的学费，而在芬兰不需要负担任何学费，后者的教育质量肯定不如前者。这也许是为什么有的学生愿意支付昂贵的学费去英美国家留学”，尤卡·克拉校长解释道，“英美大学的确将高质量与高费用结合起来了。我认为我们的教育质量也非常高，但是因为免费而造成了一些误解”。这种误解或许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应当意识到它的确在某些地方有影响。不过，免费政策对于不同地区的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这对于一些亚洲或者非洲的学生来说或许至关重要。此外，芬兰的一些大学也希望在留学生学费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自治权，诸如根据大学自己的章程决定收多少、向谁收等等，这样也可以进一步拥有选择学生的自主权。

因此，现在对于要不要对非欧盟学生征收学费也有一个较大的争议（根据协定，如果不对芬兰本国学生征收学费的话，也不能对欧盟学生收费），而芬兰的邻国瑞典和丹麦从 2010 年起就已经开始向非欧盟学生征收学费了。目前芬兰政府也提出了一个征收学费的提案，但是是否能付诸实践还取决于议会能否通过。

结语：“30年渊源，友谊和信任才是最关键的”

早在 1983 年，赫尔辛基大学与北京大学就建立了合作关系，至今已 30 年有余。两校都是享誉国内外的顶尖大学，也都非常注重国际化发展。2014 年，借着北大承办由芬兰政府和驻华使馆发起的“纯净芬兰”系列活动的机会，北大与赫尔辛基大学针对未来教育、大气以及法治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沟通。在两校合办的“科学对话”活动上，不仅签署了北大—赫尔辛基合作补充协议，展示芬兰的科技成果，同时还举办了法治、环境、教育三个领域的主题论坛。正如尤卡·克拉校长所说：“活跃的伙伴关系需要积极的人员来推动。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此次访问，希望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新开始。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几年的合作，将使两校在研究和教学上携手共进，结出硕果。最重要的是友谊和信任，这才是关键”。C&C

我的那些非洲学生

文 李安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我于1994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国，选择到北京大学亚非所工作。后来，亚非所与国政系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过18年的教书生涯，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国际学生，特别与一些非洲学生结缘，颇有一番感受，独有一份情感，也是一种特殊的经历。

记得刚到北京大学不久，我在校园里塞万提斯像前见到一位非洲学生，我就主动上前与他打招呼。原来他是一位莫桑比克留学生，在人民大学读书，来北京大学玩。当我们聊到各自的专业时，我提到对莫桑比克种植园经济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阿兰·艾扎克曼（Allen Isaacman）。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加纳殖民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其中文版和英文版分别在湖南和纽约出版），曾参考了这位专攻非洲殖民史的学者的

论著。这位莫桑比克的学生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呵，艾扎克曼教授在莫桑比克工作过，他教过我们非洲历史课。”我们聊得很欢，后来也常有来往。他毕业后回到莫桑比克，后来到莫桑比克外交部工作。没过几年，他被派到莫桑比克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我2000年随教育部代表团访问莫桑比克等非洲四国时，他还经手办理了我们的签证。

我到北京大学亚非所工作后，办公室在六院二层。六院是一个有着古朴建筑风格的小院。有一天，一位非洲女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她自我介绍来自肯尼亚，在国际政治系读书，名叫露西（Lucy Njeri Manegene）。我问她找我有何事，她回答说她正在朱锋老师指导下写有关中国与东非关系的硕士论文，题目为“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ast Africa: A Special Study on

Kenya and Tanzania (1963-1990)”（中国对东非的外交政策：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为例，1963-1990年）；她从其他教师那里听到我是搞非洲历史的，刚从国外回来，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非关系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发现露西是一位热情善良的姑娘，学习也很认真。有一次，我的女儿和儿子到学校来玩，她也正好来我办公室找我谈论文，她们在静院里玩得很开心。我还特意为她们照了一张合影。她回国时，我请她帮我带了我的几篇发表的英文文章给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教授（B.A.Ogot），她十分乐意地表示愿意。

露西回国后，曾经通过肯尼亚驻华使馆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告诉我她已经将文章转交给奥戈特教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国内碰到了来中国访问交流的奥戈特教授，当时他已是肯尼亚



◆ 李安山教授（左）与莱索托留学生Lisebo Mosisili

一所大学的校长，他还专门提到收到了我的文章)。后来，露西又来信告诉我她在肯尼亚外交部找到了工作。2008年，德国的伯尔基金会组织十位中国学者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加“中非公民对话会议”，中方与会者有曾强、徐伟忠、智颖彪、贺文萍、安春英、朴英姬、王洪一、肖玉华、洪永红和我，非洲方面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当时，与会者组织了一场活动，让与会者和肯尼亚外交部的官员对话。在肯尼亚外交部交流时，我问当时参加交流的一位官员，是否有一位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女学生在外交部任职。这位官员问她的名字，我说叫露西，他说，“哦，她就在对面的那间办公室。”我去敲门，果然见到露西。她已经不是那位腼腆的女大学生了，而是一位成熟而自信的外交官。她见到我后非常激动，我见到自己学校的学生，当然也非常高兴。我们俩人一交谈，才得知她的丈夫

也作为肯尼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告诉她北京大学刚开通了校友网，她说非常想念母校。临别时，她与我拥抱辞别，并送给我一些纪念品。回国后，我们仍然保持了电邮通讯，她后来被调到肯尼亚驻美国使领馆工作。

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后，当时有一个“第三世界外交官班”，学员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而尤以非洲学生居多。由于这个班的学生不懂中文，老师要用英文授课。我给这个班多次开过“中国与非洲关系”这门课，指导过一些非洲学生的硕士论文。其中有一位马达加斯加的学生在课堂上的一次发言给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谈到中国对非援助这一问题。他指出，中国给非洲的援助有时不到位，我请他举例。他说，中国政府曾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过一批汽车，但放在车库里不能用。我问为何不能用，他说在马达加斯加，只有很有钱的人才用汽油，

一般车子只能用柴油，而中国政府援助的汽车要用汽油，因此没人用。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能想当然，必须了解非洲国家的国情。他最后写的论文是与马达加斯加有关。

我与另一位马达加斯加女学生 Rakotoarivony R.J.Manitra 的结识也颇有缘份。我在2004年“第三世界外交官班”上认识了她，并指导了她的硕士论文。记得有一年马达加斯加总统访华时，她有幸被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馆请去陪伴总统夫人并为第一夫人当翻译。当时她已经确定了硕士论文题目为“Republic of Madagascar-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rty-Three Years' Relation and State Cooperation”（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关系与两国之间的合作）。2000年8月，我应邀参加中国教育部的访非代表团访问非洲四国，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乌干达与赞比亚，没想到在机场碰到 Manitra。一问，才知道她毕业后回国。我向她表示祝贺，问及她的工作。她的回答并不肯肯定，只是说在陪伴总统夫人时，总统夫人表示要帮助她更好地利用她所学的知识。前年，有一次，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召开国际会议。我当时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CHINA-DAC）“中国-非洲发展经验交流”项目的中方组长之一，并有机会在大会上担任主持人。会议休息期间，一位非洲少女走到我面前，说“老师好！”我一下子很惊讶。再一细看，这不是 Manitra 吗？原来她目前在马达加斯加外交部工作，近来被派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这就是缘份。

2006年，我在“第三世界外交官

班”上认识了另一位非洲学生 Lisebo Mosisili。她来自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是在英国受的本科生教育，说一口流利的带伦敦口音的英语。由于我开的课是“中国与非洲关系”，她成为班里的明星。在课堂上，她很有思想，提出的看法总有独到之处。到确定论文题目时，她提出要请我当她的论文导师，我表示乐意。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少交往。她已有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困难。但是，她认真学习，对论文一丝不苟。她的论文题目是 Lesotho-China Relations, 1966-Present: An Analysis (对 1966 年至今的莱索托 - 中国关系的分析)。在答辩前，她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建议她将自己的论文好好再看一篇，并将错误之处标示出来，列出一个正误表，答辩时交给答辩委员。在答辩会议上，她先是交给大家一张正误表，然而很自信地回答了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各种问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2006 年 6 月 15 日，我请她吃饭，既表示祝贺，也是送行，因为她即将回国。她特意送给我一本由莱索托学者 B.M.Khaketla 撰写的有关莱索托的书 - 《莱索托，1970 年》。她在上面深情地题上自己的名字，并写道：“李教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这是对我作为非洲学生的导师的最大安慰。

2008 年春季学期，一位阿拉伯女生来到我办公室。当她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介绍自己时，她的中文水平着实让我非常吃惊。我一问，原来她名叫伊美娜 (Imen Belhadj)，是来自突尼斯的留学生。早年在突尼斯学过汉语，因为在“汉语桥”的比赛中夺得第一名，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她正在撰写硕士论

文，表示希望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认为她在硕士期间接受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的训练，对她的相关知识背景和基础知识有些担心。当她向我介绍她的硕士论文是有关后结构主义并对后殖民主义及萨伊德的著作颇为熟悉时，我才放下心来。我当即向她表示，如果她能顺利完成硕士学位，我愿意指导她继续她的博士学业。

伊美娜完成硕士学位后即开始了在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很明显，在刚开始时，她感到了不少压力。然而，她对国际政治的兴趣使她认真地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她的认真、执着的学习精神给所有教授她课程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关于突尼斯妇女的论文中，她指出，突尼斯的妇女在当代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是其他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妇女所不能比拟的。她参与了学校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首先，她担任了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

的秘书长，积极促进北京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各种讲座。随后，她又参与了留学海外的非洲高智力青年人才组织的活动。她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位伯语系的阿语教学工作。去年，我们非洲研究中心与北欧非洲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首先是出版了我的英文论文小册子《中国与非洲的医疗卫生合作：以援非医疗队和抗疟活动为例》(Chinese Medical Cooperation in Africa: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Medical Teams and Anti-Malaria Campaign)，随后我提出了让伊美娜去北欧非洲研究所访学 3 个月的要求。埃塞俄比亚学者、北欧非洲研究所研究所所长范图·切鲁 (Fantu Cheru) 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这样，伊美娜于今年 4 月到北欧非洲研究所进行了三个月的访学。她在那里不仅为她拟定的题为“中国与马格里布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 李安山教授与他的非洲学生伊美娜（左）、龙刚（右）

还进行了一场讲座，受到了该所学者的好评。

我的另一位非洲学生是来自摩洛哥的李杉(Erfiki Hicham)。他的中文很不错，学习也非常认真。李杉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中国与摩洛哥经贸合作研究”的硕士论文，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论文中，他分析了摩洛哥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当代的摩洛哥-中国关系。后来，他又提出要在我的指导下继续学习。我询问了他对进一步学习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后，同意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对必修课程的学习非常认真，写的学期论文的选题总是与众不同。去年，他写了一篇有关北非动荡与摩洛哥改革之间关系的文章。他分析了摩洛哥的抗议活动与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抗议活动的区别，指出虽然摩洛哥民众也提出了类似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社会诉求，但摩洛哥有着自己的特殊之处，即隐含着某种“政治诉求”，并成为北非第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他在文中阐述了抗议活动出现后，摩洛哥采取的相应政治改革举措，并重点分析了已经举行的议会选举对未来摩洛哥政治走向的影响。他认为，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巨变绝对不是“茉莉花革命”或是“阿拉伯的春天”。北非巨变中出现了三种情况，与动荡（埃及）和内战（利比亚）不同，摩洛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摩洛哥出现的两种的政治势力将使摩洛哥出现均衡的态势。

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是来自刚果金的学生。2008年，他通过电邮给我写信，介绍了自己。他的家乡在刚果金，小时候被教士带到伦敦。

他在伦敦呆了十多年，又当了9年记者。他已经在伦敦拿到了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非政府组织与媒体的关系。当时，他已在英国的雷丁大学进入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在信中，他说他经人介绍与我联系，并提出希望到中国来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没有特别当作一回事，在回函中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告诉他在中国读博士要先学中文，因为课程是用中文讲授，博士学位论文也要用中文撰写。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收到他的电邮，告知他已经到达中国，正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这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了一年，并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不间断地汇报他的学习进展。2010年，我帮他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中文，并把他的介绍给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龙刚对他选择来中国学习的决定非常满意，也有一种使不完的劲。他经过与中国学生商量后，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刚”，意为致力于中国与刚果的友谊。我认为，对于国际学生的教育一定要充分利用北京这个地区优势，也经常有意识地带我的国际学生参与各种国际会议。

有一次，我应邀参加由世界银行和财政部联合举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非洲高级官员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我带着我的几位非洲学生一起参加。会期一天，我因要上课，就未参加下午的会议。晚上7点左右，我收到承办单位担任会议组织工作的张慧东博士的电子邮件，信中表示为我的学生收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道歉，我则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随后，我又收到龙刚发来的邮件，他向我解释了当天发生的情况。原来，在会议讨论时，他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和争论。后来，他上厕所。男厕里的便池各有一个私密间，当他完事后出来，发现一位世行妇女立在外面，他非常诧异，因为这是男厕所。那位妇女带着威胁的口气警告他，如果他再乱说话，就要让卫兵将他赶出去，他听后非常气愤，与这位女士发生了争论，得知这位妇女是美国人。后来开完会，他与一些与会的非洲代表特别是那位意见不同的非洲官员进行了交流，俩人握手言欢。我听后，又与张慧东博士核落了具体情况，觉得有必要与世界银行的官员沟通，因为龙刚是我带去参会的学生。我向当时世行学院东亚和太平洋的地区协调官菲利普·卡普(Philip Karp)先生发了一封邮件，我表明了态度：“我一般向国际学生表明，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今天发生的事令我非常尴尬：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召开的会议上命令一位非洲男士闭嘴(Shut up)。我觉得非常遗憾。”信中，我希望他了解情况后给我一个答复。之后，我并未收到任何答复。约十来天后，我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参加活动时再次碰到卡普先生，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并表示他之所以一直未回复，是因为他需要时间了解情况。后来我一直未收到答复。龙刚后来向我表示，此事说明了西方所极力推崇的“民主”、“自由”的双重标准。

2011年，我同意龙刚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阶段的学习。除了学习中文外，龙刚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并抽时间进行相关研究。他曾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在非洲是不够的？——南非、利比亚和科特迪瓦案例分析”的分析文



◆ 龙刚和同学在新疆兵团的牧场第一次体验了赶牛

章，通过三个国家的个案分析了民主和选举在非洲的遭遇。他指出，“西方国家向非洲国家推广民主，但同时又在破坏非洲的民主，将民主收回。”“非洲民选政府必须向西方国家“购买”另一种合法性，无论是掌权的政府还是在野的反对派，都必须照顾西方的战略利益。否则，这些政府将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其中包括暗杀、西方诱致的内战、叛乱或者被邻国入侵和占领等等。”这篇英文文章在非洲的网站“潘巴祖卡(PAMBAZUKA)”发表后，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和许振洲教授领导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希望在其内部刊物发表。中文版发表后，此文受到中国学术界更多学者的注意。一天，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与国外合作的英文杂志编辑的电话，希望我介绍认识龙刚，原来这份杂志觉得他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有意义，希望他修改后正式发表。经过一个假期的多次修改，他的这篇文章最近在《国际批判

思想》(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2年第2期发表。

2009年秋季，一位黑人女孩走进我办公室。原来她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名叫雷·菲利普斯(Ré Phillips)。她来找我指导她做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希望就杜波伊斯和中非关系撰写毕业论文。杜波伊斯(William E.B.Du Bois,1868-1963)是加纳籍美国黑人领袖和泛非运动的领导人，与毛泽东等早一代中国政府领导人结下了友好关系，曾三次访华。我问她为什么来找我，她谈了自己决定写这篇论文的经历。她曾满怀信心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当年已卸任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教授，觉得她当过国务卿应该什么都知道。当赖斯教授得知她要写中非关系时，就劝她改写中美关系，这样自己可以指导她。然而，雷·菲利普斯坚持要写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赖斯教授又建议她写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样自己也可以指导。不料这位非洲裔女生

执意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只好作罢，说她没能力指导。这也说明了赖斯教授实事求是的品行。后来，雷·菲利普斯在网上搜索到我的名字并与负责斯坦福大学-北大项目主任申晓红博士联系后来中国。她选修了我和王锁劳博士为北大/伦敦经济学院(PKU/LSE)双硕士项目合开的“中国-非洲与中国-中东关系”课程的非洲部分，并撰写了“从杜波伊斯看当代非洲-中国关系”的学期论文。有意思的是，由于雷·菲利普斯觉得这门课收益很大，回斯坦福大学后向学校反映，从而使我和王锁劳开设的这门课列为该校的课程。这既说明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某种优势，也反映了世界名校在采纳学生意见方面的机制完善。一位非洲裔美国学生对中非关系感兴趣，并孜孜以求地坚持要写这一方面的论文，这从某种角度说明了中非关系在国际学术界的影 响。其次，一位美国学生因自己学校无人指导论文而毅然决定到中国来挑选指导教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学者在中非关系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再次，作为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从自己的角度选的论文题目很有意义——从一位爱好和平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与泛非运动领袖来看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目前，雷·菲利普斯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除了非洲学生之外，近年来，我经常接到国外学生的来信，或希望解答问题，或要求采访，或希望介绍研究资料。对于这些学生的要求，我一般会尽量满足。2009年11月2日，我收到一位名叫安伟杰(Andrej Jautze)的德国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名读中国研究以及美国研

究的德国大学生。我正在忙于写硕士论文，题目为“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我最近看了您所写的三篇文章“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改变（应为“转变”）”，“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你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您文章我不仅仅更加了解了中非关系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我也对您的理论概念非常感兴趣。我想麻烦您问一下，您如果属于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学派，那么是哪一个学派？德国所有的大学规定写硕士论文得以具体的理论概念方式来分析每一个题目，因此，我很想知道您自己认为您是哪个学派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我的汉语水平还太低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

谢谢您！

安伟杰（德文名字：Andrej）”

收到他的来信后，我觉得自己学识有限，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熟悉。因此，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安伟杰先生：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函。关于我的理论究竟属于何种学派，有两点说明。其一，我拿的学位是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并非学国际关系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熟悉，也不愿意去硬套某一种理论。其二，中国学者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与角度，我个人比较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非关系。我觉得中国的角度和历史的方法比较切合实际。我对你的流畅的中文表达印象深刻。相信你能成为一名既懂中文又愿

意以客观心态了解中国的新一代德国学者。祝好！

李安山敬上”

这位德国大学生在第二天就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教授：您好！

谢谢您给我回信。本人同意您的说法，大部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利弊兼具，不过依我看是弊大于利。虽然主流媒体天天报道的“地球村”是存在的，但是各个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西方和东方文化之差异以外，连一个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原信如此]。关于中国最近几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学派”的发展我也稍微了解一些。总之，通过读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章，我认为以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不理解他人的动机以及思维方式导致某些学者以偏概全，并且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有绝对性的。

谢谢您帮我理解中国的情况和您自己的看法。祝好！

安伟杰”

从安伟杰的来信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德国学生能以流利的中文写信，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增。他希望了解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见解，这也说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在加强。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这意味着他既关注中美关系，也敏感地意识到中非关系与中美关系的相关性。这说明中非关

系对既定的国际秩序已产生明显的影响。他也意识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以既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理解他人的动机及思维方式去做研究，这种分析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

这些年来，由于中非关系不断升温，对中非关系感兴趣的学生也不断增多。我指导的外国研究生多是选择了中非关系的论文题目。一位挪威学生林颖欣（Inger Marie Rossing）写中国与挪威援助制度的比较，一位德国学生周德凯（David Brenner）写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一位意大利学生吉贝莎（吉贝莎，Roberta Cucchiario）写中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非洲的情况。从与这些学生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外的青年学生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倍增。这些外国学生对中国不甚了解。特别是非洲学生，他们怀着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好奇和对非洲美好前景的憧憬来到中国。这些青年学子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者，也是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更是将来真正理解中国、促进中外友好关系的生力军。与他们的接触是引导，更是平等的交流。

中国，只有认真对待国际学生特别是从非洲来的学生，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

（本文原刊于程涛主编《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承蒙李安山教授提供并惠允转载，特此感谢。） C&C

一位新加坡留学生的“行路中国”

文 张馨蕊

郭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2级新加坡留学生。他自小在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下成长、学习，却在高中毕业并服完两年兵役之后，选择只身来到中国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秉承“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信念，曾骑行新疆、西藏、云南、四川等多个省份。2014年暑假，他沿着318国道从四川成都骑行至西藏拉萨，骑行公里数3000公里，历时两个月。骑行途中他曾到达珠峰大本营，也曾深入尼泊尔境内，感受异国风土人

情。从首都城市到滇藏边境，从繁华喧嚣到人迹罕至，他一路骑行，一路感受。万里旅程，带给他的不仅是精彩的人生经历，也不仅是宽广的视野胸怀，而更是经历自然洗礼之后内心的虔诚与宁静。在骑车行经中国西南西北边疆大片土地之后，郭丹对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文有了自己独特的解读和体悟。

骑行：远方看不完的风景

中国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值

得去细细体会、探索。可是，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高和旅游业蒸蒸日上的迅速发展，数不清的旅游景区都被过度开发而变得做作矫揉，失掉了本有的韵味和风姿。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观赏所谓热门景点，拍照留念，然后走上归程，回到原点——旅行的意义在这其中已经消逝。

旅行，是躯体在疲倦困乏之后的舒爽满足，是心灵在酸甜苦辣之后的谦卑宽阔，更是思维享受的净化升华。就像在去往西藏道路上看到的朝





“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奉行的生活方式。”

圣者，他们踏着自己的脚步、乘着自己的信仰，一步一跪拜地朝着心中神圣的目的地前行。郭丹认为，这种在心灵上获得慰藉的过程，才是最重要和最真实的乐趣。回想起他曾到过繁华的香港，那里快捷的步伐和忙碌的人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香港是一个与新加坡极为相似的城市，两者有着雷同的生活状态。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只有离开城市，走到宁静平和、了无人烟的边疆去，才能从身体与环境的融合中理解大自然的伟力。

郭丹描述他骑行于新疆广袤土地上的情景：四周寂静，两三公里的公路前后无人，唯有自己、爱车、远山与苍穹。偶尔，他会经过盆地中的绿洲，看到欣欣向荣的城镇以及当地居民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那时，时光仿佛回溯到了汉唐时期。楼兰依旧繁

荣，驼铃依旧悠扬。远行的商旅将东亚和西亚托在驼背上，脚步匆忙，风尘飞扬。生活在截然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常常一厢情愿地猜想着偏远地区的物质和精神的贫瘠，将自作多情的施舍与怜悯施加于自己并不了解的人们，并自以为好意地干扰、入侵他们的生活。

在与边疆原住民的接触当中，郭丹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幸福与充实。他们纯粹的人生信仰和淳朴的生活方式，在郭丹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根本不贫穷，反而可能比城市人生活得更加富足。他认为，这种富足来自于单纯的快乐和无束的自由，是种使生活与自然呼吸与共的人生哲学。“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奉行的生活方式。”他如是说。走出日常生活的小圈子，跳出井底，他发现了远方的人们以毅然不同的方式

寻求快乐。牧羊耕田，饮酒欢歌，传统的生活方式延续多年而鲜有改变。而这，大概是对于祖先的骨血和文明的最好继承。

地大物博的中国，其丰富多彩的内涵深阔得难以通过语言领悟。钟灵云秀的原始风貌就静静地等着前行的旅人。要想领略它们无比的美好，绝对不是到达和拍照，而恰恰是旅途的过程本身。身体和心灵都在路上，这本身就是旅行的意义和乐趣所在。

西藏——心跳之旅

318国道是中国最长的国道之一，从四川成都一直延伸到西藏拉萨，有着重要的军事和文化地位。虽然作为一条国道，但由于险峻恶劣的自然环境，道路时常被垮塌的山体拦腰折断。

穿山路段紧邻悬崖峭壁，而路道边缘则是不见底的深渊。该国道是有经验的骑行者必经之地，然而事故频发，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意外。而这条险象环生的道路，就是郭丹曾经骑行的路线。

就在他出发的两天前，便有一辆大巴翻进悬崖，一百多人丧生，尸骨难寻。然而，这却没有阻止他前行的决心。到拉萨最险的一段路平均海拔4000米，郭丹在骑行入藏之后便感受到了高原反应的威力。他说，体力上的挑战只是一个方面，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当地先天险峻的自然条件。骑行路线从成都开始就已经是山地了。而入藏之后，郭丹每天的行程便是晨起翻越一座山，晚上在山脚歇息，等待第二天的翻越。与郭丹同行的旅伴止行于拉萨，二人道别之后，郭丹便一人独自向西。

但是，他的旅程并不寂寞。他很快就偶遇了其他行者，并结伴一同骑行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他站在世界之巅，望着30公里之外那珠峰荒凉的北坡。他感叹道，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停滞，世界好似在那里到达了尽头。宇宙之初，洪荒之景，生命对于自然的敬畏与赞叹，大概是所有站在珠峰脚下的行者在狂喜之后的所想所感吧！

继续前行的路途更加危险，在郭丹之后通过入藏路段丧生的骑行者的事故时有发生。根据他的回忆，骑行的路上一旦由于体力不支或是注意力不够集中，便可能直接摔下路边的悬崖。他与同伴们通过互相支持来克服心中的恐惧、保持冷静淡定，这使他没有过度担心旅行的安全问题，而能

最终顺利地为这次“长征”之行画下美好的句点。

留学生眼中的中国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无论是在经贸、政治或是文化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新加坡接受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人们，或多或少还是对中国有不理解之处。作为一名中文流利的新加坡留学生，郭丹从生活中领会到，通过纸笔介绍的中国很容易出现失实之处，必须到中国亲眼看看才能确切地构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他指出，对于长期不在中国生活而不理解某些事件发生的根据、背景和人文因素的人来说，对中国做出长篇大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在郭丹看来，中国有很多值得别国借鉴与学习的经验，而中国政府事实上也有能力做成很多事情。就如在骑行西藏的旅程中，他在偏远的藏民家中发现了洗衣机，感到十分惊诧。询问过后，得知是家电下乡政策的推行结果。以此看来，该政策能够在偏远地区有力地贯彻执行，其成果还是值得称赞的。郭丹还注意到，在偏远的地方仍旧有稳定的电力和供水保障。这些往往被忽视的细节，反映了基本设施建设的有力推行。此外，青藏铁路、高铁的修建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撑。他赞道，中国能够成功做成这几件重大的项目工程，从世界范围来说已是令人瞩目的成就。

说到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他认为中国对于问题的处理方式和别国存在

着某些不同之处。郭丹指出，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一种制度的选择，是基于该国的实际背景和特定环境下考量得出的适用性解决方案。他以电动车禁行为例，说明如果是在新加坡推行该法令，便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有力的推行；而在中国实行电动车禁行，则会对许多人的生计造成影响和威胁，因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强制推行。新加坡国家规模比较小却拥有优良的深水港，加之适应国情的法制，于是有了繁荣的经济和富裕的国民。中国的人口和国土规模与新加坡有着明显的差别，因而不可盲目推崇或者模仿新加坡的模式。

关于来华留学的原因，郭丹认为每个留学生选择来中国的目的都不同，目标是十分多元化的。对他来说，来北京留学四年如果纯粹只是知道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就没资格称作是在中国停留了四年的学生。他的目的是能够更多地看看中国广袤的土地和人民，跨越书本文字当中的介绍、领悟课堂当中无法学习到的智慧，从而渐渐将阅历内化为个人的涵养与素质。

此外，他也认为留学是个认识不同国家青年的珍贵机会。他在北京大学结交了来自太平洋岛国、非洲等国的留学生，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感想，认识到他们对自己国家以及其他不同国家的看法。他相信通过互相交流内心的想法，必能使胸怀和视野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多元与包容。这些个人的改变，不是一张履历和或是一纸文凭能够替代和解释的，而是经过岁月沉淀淘洗，最终成为人生宝贵的财富。 C&C

架起沟通中国与希腊的桥梁

专访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埃琳娜·埃弗拉米多

文 李佳璐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曾任希腊驻华使馆教育和文化专员，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华期间的不同阶段，她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各高校传播和推广希腊文化，并积极参与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的课程建设。如今，她在北京大学开设“现代希腊史”和“现代希腊语”两门课，向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感兴趣的学生教授语言和文化知识。今年，是埃琳娜在中国的第13个年头，让我们一起倾听这位希腊教师在北大的故事。

在中国的希腊人

问：来中国生活了13年了，感觉怎么样？

答：是啊，都13年了。其实虽然13年看起来很长，尽管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无论多长时间用来了解中国都是不够的。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认识了中国各地方的人，了解了他们的个性，喜好和他们的梦想。另外，我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辈子宝贵的财富。

我认识的中国人，他们的梦想都是获得更好的生活。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更多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对自我精神的历练和对世界未知的探求。在中国，这种求索精神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北大。在这里，学生们都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知识。不单单是掌握一门语言，更是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

Q：那在北大学生对古代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哪种语言更感兴趣呢？

A：他们对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都很感兴趣，因为希腊语言是了解西方

“教育将会是我这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在大使馆还是在北大。我的关注点一直都是交流和教育。而这两件事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

文化的基础。他们知道西方文化所有都开始于希腊文化，而古希腊语是这一切的钥匙。同时他们也很想知道现代希腊人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希腊人自身如何理解这种文化的延续性？我们是希腊人，生活于希腊，这个国家已经存续了将近5000年的历史，这和中国文化存在着很高的同质性。希腊人如何看待自己之前的文化？如何建构起自己的身份认同？这都是他们感兴趣的。

Q：你如何定位希腊在欧洲文化中的位置呢？

A：我想我会回溯到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欧洲文化起源于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化。从希腊的一个岛屿，克里特，希腊语言出现并得以发展，随后又成为拉丁字母的基础。后来又从拉丁语衍生出了英语、意大利语、法语。

如今28%的英语词汇都是沿用的希腊词语，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

实际上很多词汇都是一半的希腊词根，一般的拉丁词根。比如Television-tele是从古希腊语而来的，意味着Far，而Vision则来自拉丁语。如果我们把这一类词再加入进来，这个比例就不止28%了。中国的学生对这一块特别很感兴趣，他们希望知道哪些希腊语素是欧洲其他语言的来源。

每一天我们都用Economic, Politics, Democracy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生活。每天我们也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Music, Television。或者是Medicine, Biology，它们都是希腊词语。甚至连Europe这个词都是希腊词语。这个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的名字就是Ευρώπη(欧罗巴)。



◆ 伦勃朗描绘希腊神话的油画《被绑架的欧罗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谈论语言的时候，它们往往意指特定的机构，比如 Theatre，语言的延续同时意味着最早的戏剧是缘起于希腊的。Poetry 也是这样，也就是说西方世界的第一首诗歌是希腊人在希腊用希腊语写成的。这种历史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仅仅将希腊的文化局限在过往之中，如今的希腊文化也是异彩纷呈的。

由于语言的限制，希腊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很少有人了解。比如说一首英语诗歌，你很容易去把握她的韵味，她的语气，她的隐喻，但是对于希腊诗歌来说，这很难实现。在西方世界中，中国的诗歌也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虽然这是一个有着数亿人使用的语言，但是在西方世界，还是鲜有人得知她的美。如今我们希腊有两位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乔治·塞菲里斯和奥德修斯·埃里蒂斯。而现今希腊的绘画、文学、雕塑、

戏剧、音乐、电影都是非常具有活力的。

从希腊大使馆到北京大学

Q: 您结束了希腊大使馆的工作就直接来到了北京大学任教，那么从外交官员到大学教师，有没有角色转换上的适应过程？

A: 其实我当时在希腊大使馆主要负责的就是有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工作本身就要求和很多高校经常联系。我经常会和北京高校进行交流，内容不仅仅是局限在希腊课程上面。我选择从事全职教书而不是做兼职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育之中。

Q: 2000 年，北大成立了希腊研究中心，您也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成员。2011 年，该中心举办了一个关于“希腊研究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研讨会，您是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国希腊研究的进展吗？

A: 这个中心已有了 13 年的历史，这些年里它有了很大进展。一开始我们只有很少的学生，课程上也只教授希腊语言的初级课程。如今，我们的学生有的已经是研究希腊的博士生，跟我一起在做研究。他们不仅能说非常好的希腊语，同时也对希腊现实有很深入的了解，这是让我们作为老师很骄傲的事情。

与此同时，学校里也涌现出更多对希腊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在学校里，我到处能遇到我教过的学生跟我问好。说明这几年来，有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希腊文化，他们其中有一些人走的更远。他们对希腊的音乐、电影、文学评论都有自己的体悟。去年在希腊研究中心，我们每两周放映一些希腊电影，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有关希腊文化的讲座或者活动。

2011年的那次研讨会是第一次研究希腊的中国学者的集会。会上很多学者为了研究希腊历史和希腊文化奉献了一生。整场集会让人非常感动。我希望能有机会在北大举办第二次这样的研讨会。我们现在准备将第一次会议的文章集合发表。这不仅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是对今后的希腊研究也是有所贡献的。

“教育是我一生的事”

Q: 为什么会一直执着于做有关教育的事情?

A: 我确信教育是一切，不论是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我的梦想一直都是过一种更加丰裕的生活，而教育则是这种生活的关键。我从很小就有这样的想法。在你很小的时候，很多的印象都是模糊的存在于你的脑海之中的。但是随着你长大，很多想

法便能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对于国家、民族来说也是这样的，光有一腔热血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有教育来建构一个国家的认同感。虽然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模糊的感觉，但是随着我长大，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和坚定。教育将会是我这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在大使馆还是在北大。我的关注点一直都是交流和教育。而这两件事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

Q: 您如何评价希腊如今的教育体系呢?

A: 现在希腊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之中。从经济危机以来这几年都是这样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波及经济发展，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在过去的五六年之间，希腊人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强，他们的安全感下降。他们对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处境都存有怀疑。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有很大影响。虽然情况如今在转好，但是就事实而言很

多人的境况还是很差。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纷纷前往欧洲其他国家、亚洲、乃至非洲国家去寻找工作机会。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希腊，也出现在希腊其他国家，因为欧洲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

Q: 那您觉得北大如今有关希腊的文化教育如何?

A: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罗念生是民国时期中国研究希腊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后来他的儿子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麟开始做希腊戏剧，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他父亲的事业。上周的“俄狄浦斯王”就是由他指导北大学生排演的。说实话，这部戏剧惊艳了我。今年暑期，他们还到海外参与国家戏剧节。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交流经验。

为了表演，你需要对希腊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走到角色里面。同时，你也因此会对希腊戏剧在希腊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记得，演出结束后，有很多北大学生留在那儿询问有关希腊戏剧的问题。通过戏剧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彼此文化。除此之外，在暑假我们还与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on Greece - China 联合开设以希腊研究为主题的暑期项目，依托希腊四所高校开设课程，课程内容涉及希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在这 13 天之中，学生们游历了希腊中部、北部、西部及爱琴海诸岛。我们一起去了德尔菲神庙、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场、米诺斯神殿、圣托里尼岛、阿克罗斯河。全程我都跟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生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走进希腊。 **C&C**



◆ 本文作者与埃琳娜·埃弗拉米多（左）

取一捧乞力马扎罗的雪

文 年雪琦 王书文



坦桑尼亚时间2014年7月21日早8:40分,北京大学教职工登山队成功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该登山队在校工会和体教部的支持下,由体教部刘博老师领队,队员有16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他们于7月15日踏上非洲的征程,17日从马兰古门向山顶进发,经过六天的艰苦跋涉,成功登上了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乌呼鲁峰。

该活动彰显了北京大学老师和同学们不畏艰险、勇于挑战的精神面貌。同时,今年正值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50周年,北大登山队带去了北京大学的纪念礼物,以此祝愿中坦友好世代长青。

这是一场从热带到极寒的跋涉——海拔5895米,穿越雨林、草原、高山草甸和荒漠,纯洁的白雪是对勇敢者最终的馈赠。

这是一次关于友谊、梦想和爱的旅程——一片热情的土地,一座“光明之山”,一群人的梦想,中坦两国的友谊。2014年是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50周年,这也许是北大登山队送给两国友谊最好的礼物。

坦桑尼亚时间7月21日早8时40分,经过5天的艰苦攀登,北京大学教职工登山队16名队员全员成功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据悉,北大乞力马扎罗登山队是登顶人数最多的中国大学教职工团队。

写在非洲极点的梦想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及东非大裂谷以南,其年轻的主峰乌呼

鲁峰海拔5895米,是非洲最高的山峰,被称为“非洲屋脊”、“赤道雪峰”。每年有两万人尝试攀登乞力马扎罗,最终能成功登顶的只有百分之四十。

“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关于乞力马扎罗,海明威这样说。

“今年是中国和坦桑尼亚建交50周年,我们想代表北大,将中非友谊带上非洲的极点。”登山队队长刘博说。

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健身协会成立于2009年,采用户外健身的项目促进北大教职工的健康水平、提升生活品味、提高生命质量,曾先后组织徒步穿越、健步走等户外活动30余次。经过前期精心策划和评估,一个16人的登山队诞生了。

这个队伍由北大教职工和家属组成,男女各占一半,其中最大的是57岁的新闻传播学院徐勤霞老师,最年轻的北大

子弟汤欣哲只有18岁。队伍中,除了队长刘博,只有赵东岩曾有过攀爬雪山的经历。

体能、技术、高原适应,都是这个队伍所面临的挑战。为了这次登山,他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艰苦训练。队员们每周至少在五四操场上跑步训练8公里,参加了多次户外徒步拉练,包括夜登泰山训练、‘全国高校300公里徒步马拉松’伴走活动等。此外,队员们参与国家课题研究,在模拟海拔5000米的低氧舱,持续一个月进行适应性训练研究。训练虽艰苦,但没有人说累。“乞力马扎罗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和向往。”刘博说。

毅力与勇气的较量

7月15日踏上前往非洲的征程,17日从马兰古门向山顶进发。在陡峭的山路和丛林中,每天平均徒步12公里。前



◆ 北京大学教职工登山队成功登顶乞力马扎罗

两天徒步至三千米的好伦博营地；第三天在 3000 米到 4000 米海拔往返进行高原反应适应；第四天行程更加艰难，由草原过渡到了莽莽高原荒漠，有成员出现嗜睡或兴奋两种较极端反应。

“我躺床上，头疼得根本无法入睡，心中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断袭来，头脑里不断在考虑：现在海拔 4800 米，还有 1000 多米高度，我能不能坚持到登顶？中途会不会出问题？到底值不值得冒这个险？”王中琰回忆道。但最终，因为信赖团队，他依然坚持登顶。

登顶的冲刺阶段，凌晨 12 点，气温零下 15 度，登山队出发了。

这是最难的一段路。火山岩碎石、陡峭的道路、1200 余米的垂直上升、严重的高原反应、寒冷……同行的其他队伍中，不少人选择了放弃，中途折返回营地。北大的队员们戴着头灯往前行进着，头痛、恶心、意志力消沉等现象不断发生。“当我信心满满，但阿喀琉斯的后脚跟隐隐作痛之时，我知道我在户

外还是一个小学生。”信息管理系顾晓光老师说。

刘博安排年龄最大的徐勤霞走在前面，以保持整个队伍前进的节奏。徐勤霞的背影也成为一种信念的象征，看到那个略显柔弱的背影，队员们都充满了信心与希望。李华夫妇相互支撑，像照顾孩子一样支持着彼此，到了 5700 米以后，“整个人都木了，意识有点模糊，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走上去的，还有高原反应，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

但是越向上，风景越宏美。乞力马扎罗几乎位于赤道，差不多看得见南北两个半球的全部星空，队员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片令人震撼又宁静的星空，“有一种随时可以绝尘而去的禅意”。

在离山顶还有两三百米的“假顶”处，向导询问队员们是否需要折返。刘博十分坚定：“我们要爬上去！”迎着朝阳，队员们终于在八点四十分全员成功登顶！

“当我们披星戴月踏上顶峰，看到了

海明威笔下乞力马扎罗的雪时，正好一轮红日跳上云海，照亮了我的脸，那一刻，我泪如雨下。”杨芳音感慨回忆道。

当同队的人激动地流下泪水时，顾晓光知道人生的悲欢离合可能就在一瞬间。“而一瞬间太长，是因为他们彼此都在乎着对方。”

由于过度劳累，两位老师出现了高原反应，徐勤霞出现困倦，顾晓光也开始走路发晃，于是乞力马扎罗的山上出现了壮观的一幕——几个黑人向导架起他们两人，申一博缀后“护驾”，快速的向低海拔营地跑去，扬起粉尘无数。“黑人果然是全世界最能跑的。”杨芳音笑着说。

从海拔 5895 米下降到海拔 3700 米，队员们一口气走了 22 个小时，才到达氧气相对

充足的营地，这的确是一场毅力与勇气的较量。

爱的延续新的旅程

登山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徐勤霞今年 57 岁。徐勤霞的先生是已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学界的优秀学者，他生前曾攀登过乞力马扎罗山，但遗憾止步于 2000 多米。这次出发前徐勤霞将与先生的合影装进背包里默默地说：“我们一同要去登非洲最高峰了，无论多么艰难我一定让你登上顶峰”。

此刻，在顶峰，徐勤霞哽咽着对故去的先生说：“我知道你在遥不可及的天上，而乞力马扎罗是今生我所能登上的离天最近的地方，我为你圆梦来了，你可看到了我？”尽管听不到回音，但她仍能感觉到他们此刻心心相通。

7 月 19 日是顾晓光的生日。非洲向

导亲手制作了甜美的生日蛋糕，队员们提前偷偷准备了生日礼物——乞力马扎罗的雪。当地的非洲人淳朴而热情，他们围着顾晓光纵情放歌、恣意舞蹈，同行的队员们也一同挥动手臂，笑容满溢。

小木屋里大家的欢声笑语，登山路上队友的鼓励和帮助，黑人向导和背夫们一路的歌声，队友生日时的惊喜和眼泪……乞力马扎罗的雪，似乎使感情变得纯真、生命也变得纯粹起来了。

这是北大建校以来，教职工户外团队登得最高、走得最远的地方。乞力马扎罗之旅，是一曲团队协作、友爱互助的赞歌。校医院的李华大夫是登山队的队医，她挂念着队友们的身体状况，始终自己坚持背包，怕若是向导背包，有需要的队友不能及时取到药。

“如果没有北大教职工户外健身协会这个团队，没有出发之前系统、科学的训练，没有攀登过程中队友们的相互支持和鼓励，我们16人不可能全部登顶。”徐勤霞说。


“登山是寻找生命意义的一个过程，我爱并享受这个过程，我会一直找下去，它让我体会到世界是如此广博、精彩。”刘博说。

顾晓光则为这次攀登作了一首诗：
请乞力马扎罗矗立在我生命里，
让生命永远存有如此般山峰，
扩展心胸的广度，
培养心魄的气度，
拉伸生命的宽度，
温润生活的力度。

（本文转载自2014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校报》。感谢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刘博老师慷慨提供照片）

彼岸观史

北大-耶鲁历史系博士生交流项目十年回望

 聂艺菲

2004年的燕园之春，和风细柳，繁花似锦。生机盎然，万物更新的时节，北京大学的国际交流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北大和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正式开启，北大学生开始漂洋过海，到太平洋的彼岸聆听历史学人的探索

与思考。迄今为止，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已经走过了十年寒暑，已有20多位北大学子在耶鲁度过了书香味的光阴，他们在耶鲁的岁月不仅在他们的学术生活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于北大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冬的酝酿：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的孕育

2003年11月，耶鲁大学代表团访问北大，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副校长琳达·洛里默(Linda Lorimer)和历史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访问北大。在耶鲁代表团参加的一系列活动中，双方在加强两校合作，促进学术交流方面，达成了共识。在随后的活动中，史景迁教授来到历史系作了专题讲座，讲座之后，他表达了建立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的愿望，希望双方每年各派一两名学生互相访问学习。北京大学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在中国长居翘楚，而在外国史领域稍显不足；耶鲁的欧洲史和美国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史景迁教授本人作为欧美史学界研究中国史的知名学者，看到了双方合作的契机，认为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提高。次年3月，耶鲁方面发来合作提议，05年北大即选派了两名学生去耶鲁进行学习。

根据合作协议，北大选派的学生研究领域应为历史学，但是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系，历史相关的人类学、艺术史、美国研究、

宗教研究、政治学等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也可以参加。选拔委员会每年也由各个院系的教师组成，包括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历史系等。虽然每年的选拔人员会有所变动，但是一直保持着跨学科、多院系的传统，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覆盖面很广，与历史学有关的院系都可以从中受益。

这个项目选派的学生全部为博士研究生，据时任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的介绍，博士研究生是北京大学最终端的人才，代表了北京大学最高档次的学位，更能体现出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北大本科生的国际交流项目当时已经颇具规模，而硕士研究生在其学术发展阶段仅仅是一个过渡，因此选派博士生去耶鲁交流具有更显著的学术意义。

史景迁教授是欧美史学界研究中国史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和太太金安平教授一起作为该项目耶鲁方面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为项目的实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实际上，耶鲁方面并没有支持项目的专项资金，每年，史景迁教授都要千方百计地为项目寻找资源，根据北大所需安排学生的



研究领域为他们联系院系、安排导师，他的太太金安平教授也扮演者具体协调人的角色。

据历史学系 03 级博士生彭琦回忆，她到了美国的第一天，从纽约肯尼迪机场乘坐校方安排的出租车直接驶往纽黑文的公寓，结果惊讶地发现站在公寓门口等候的正是史景迁教授，就为了把房间钥匙交给北大来的学生。据学生们回忆，史景迁教授经常在家里宴请中国学生，在外国人看来，这是很高的礼遇。在史景迁教授的家里一边享用美味的事物，一边讨论中西历史问题，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回忆。今年三月上旬，史景迁教授到访北大，几乎所有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学生都从各地赶过来参加与史景迁教授的聚会，可见学生们与教授感情之深厚。

火花激荡：教育理念的碰撞

作为一所西方大学，耶鲁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路和北大都存在着一些区别。在中国大学，课程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但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讨论的 seminar 为主，而老师讲授的内容比较少，主要起到引导和培养的作用。我校派出的博士生普遍认为，该校研讨班对他们的帮助最大。历史学系 04 级博士高岳谈到：“耶鲁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研讨课使我亲身体会到

美国大学课堂自由和活跃的气氛，同学间热烈的讨论激发了大家的灵感和思考。在这里，我体会到教授和同学们怎样去分析和评价一本书，从研究方法及至书中论述的一个细节问题，都会有充分的讨论。还有，教师是怎样设计一个学期的课程和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会指定一本书为课堂讨论的主题，并如何引导学生对一本书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也让我这里的课堂上深有体会。我想，这对于今后也要从事教学的我也是受益匪浅的。”06 年参加该项目的徐立伟表示，耶鲁课堂多元的讨论视角非常值得借鉴，“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知识背景的研究生，其思想在课堂上激烈碰撞。国际化与多元化是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方向，应将留学生真正引入到教学与科研中来”。

耶鲁课程的阅读量很大，一门课每周会有三四本书的阅读任务。耶鲁每年有三个学期，每学期只有 14 周，所以课程非常紧凑，哪怕只选修三门课就已经非常忙碌了。历史学系 11 级博士冯立冰说：“在耶鲁学习的过程是艰辛的，也是非常收获的，三门课每周的阅读量在 500 到 800 页之间，通过阅读我提高了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速度，学会了带着问题有效率的阅读。”耶鲁通过这种系统而密集的阅读，多元视角的讨论，活跃的课堂参与，以及主讲教授的高水平指导，展现了卓越的研究生教育水平。

另外，耶鲁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他们认为，学生毕业之后很

可能不仅仅要应对国内的问题，还会处理国际事务，所以培养能使适应全球化发展、真正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尤为重要。因此，耶鲁为学生创造吸纳跨国背景的知识条件，提供充足的出国交流机会。

除此之外，耶鲁大学很重视教授的想法，学校的行政机关是围绕教授的要求运转的，如果教授们有需要实现的想法，校长和学校机关都会尽量帮忙实现。史景迁教授作为一个并不掌握机关权力的教授，他创办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的想法即得到了学校的尊重，顺利得以实现。正是这样的理念与传统，保证了学术思想能够充分生根发芽，学术发展的需要能够被及时地发现和满足，学术交流活动蓬勃发展，耶鲁大学目前的学术声望与地位应当归功于其良好的学术传统。

东风桃李：彼岸归来好读书

迄今为止，已经有 23 位北大博士生借助这个项目得到了去耶鲁交流的机会。其中，最早去交流的一批学生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北大和其他学校成为了教师。

历史学系 04 级博士陈长伟是第一批被选派的学生，现在已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他介绍道，当年的他在耶鲁的导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研究冷战问题最著名的学者，他以历史学的方式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他目前的研究思路与其十分相似，仍然是以历史学的视角探讨当代国际问题，可以说，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正是从耶鲁开始的。当年，他在耶鲁选修过三门课程，其中的大战略研讨班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研讨班是耶鲁培养政治家的摇篮，共分为三部分：理论研讨、暑期实习和关于当代问题的讨论，其中，他参加了第一学期的理论研讨。课程每周会选取一个西方人视野中的战略家，涉及战争、外交、霸权的产生与维护等主题。除了主持课程的教授，研讨班还会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政要参与学生讨论。陈长伟老师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年的教材，他说，时至今日，仍然在消化当年在耶鲁吸取到的知识，还在借鉴他们的思路，思考自己的研究。研讨班还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意识地为学生搭建人脉，为学生创造接触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如有一天教授通知晚上参加晚宴，要介绍一名客人给大家，结果大家到场之后发现这位客人竟然是基辛格。

历史学系 11 级博士杜华介绍说，耶鲁大学 Joanne Freeman 教授的课程围绕着政治文化展开，“不仅丰富我的知识，更让我了解

到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特点。正是她的课程，启发我思考 public opinion 与美国民主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后也成为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

耶鲁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也令学生们交口称赞。据彭琦说，耶鲁的藏书量之丰富让人叹为观止，尤其在她最关心的美国宗教史方面，解决了长久以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的烦恼。耶鲁还藏有很多珍贵的善本、手稿和档案，数据库应有尽有而且还在不断扩充。图书馆的服务之周全更让人拍案叫绝，不论馆藏在耶鲁的哪个角落，只要在网上提交一个申请，很快就能送到离读者最近的大台，并用电子邮件通知领取；倘若本校没有的书籍，只要美国境内的图书馆有收藏并且允许外借，同样只要在网上提交一个申请，就能在承诺的工作日内送到指定大台，而且全程免费。至于图书馆的硬件设施更是不在话下，“每每坐在宽敞的阅览室中，仰望着装饰成教堂风格的古老大厅，三三两两的各种发色的学生穿梭其间，总是难免有所感慨”。

不仅中国学生在耶鲁感觉收获颇丰，执行该项目的耶鲁大学博士生在北京大学的交流活动也有令人瞩目的成果。耶鲁历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 John Delury，在北大历史学系进修期间与中国同学们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流，积极参与了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的课程改革，获得学生赠送的“亦师亦友”锦旗一面。他协助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的老师设计了三门课程：外文原版教材阅读指导，外文历史文选阅读指导，外文历史文献选读。他不计报酬，主动承担了历史学系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一起发起招聘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北大研修的博士生参与教学的项目。该项目已经开展，于 2007 年春季学期聘请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 Rod Campbell 担任外文历史文选阅读指导一课的任课老师。Delury 和 Campbell 的课程都受到我校学生的欢迎。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不仅给北大学生到美国研修创造条件，也为耶鲁大学来的博士生提供接触中国学生的一个平台，使得耶鲁以及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学法在北大传播。这对与培养和建立美国青年汉学家与中国未来的历史学者及美国研究者的友谊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架桥铺路作用。

彼岸归来，虽然在耶鲁度过的岁月已经成为一些人的记忆，但是耶鲁的气息永远搏动在他们的血脉里。北大与耶鲁的对话，为北大历史学人打开了一项新的大门，不仅学生们收获了特别的学习体验，而且对于北大的学科建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十年光影，是双方国际学术交流史上灿烂的一笔，未来，北大与耶鲁的缘分还将继续延续下去。C&C

盛放于世界尽头

来自IARU暑期学校前沿的报道（续）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是由十所具有相同国际视野和相似价值取向的大学组成的，致力于为未来世界培养领导人才，为未来全球各高校加强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提供平台。联盟于2006年1月成立，联盟中的十所高校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每年暑假，IARU项目都会为这十所全球顶尖的综合类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提供互相交换的学习机会。

在2014年的这个暑假里，二十名北大学生有幸参加IARU的暑期学校，奔赴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求新知，结交新朋。接续上期，本期《合作与交流》继续带来他们的体验与心声。

东瀛时光： 讲述·沟通·理解

毛思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发自日本东京

从梅雨季的尾巴到盛夏的序幕，我每天走出本乡三丁目的地铁站，穿过江户时代的赤门，在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文一号馆上了岁数的教室中上课。暑期学校的日子像东京大学校园银杏和木的小路一样安静，也像穿梭在迷宫般的新宿站一样刺激冒险充满挑战。通过IARU东京大学的“Japan in Today's World”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对这个国家有着同样好奇的朋友们学习交流，让我再次确认，对国际关系的初心未改，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的热情仍在，在不同文化的冲击碰撞中，我们用心聆听他人的讲述，真诚地沟通，更全面地理解了对方，也让对方了解自己。

本次课程的主题是“当今世界中的日本”，课程负责人藤原归一先生是

东京大学负有声望的国际关系教授（有趣的是当时东大图书馆举办的关于“世界和平”的主题书展恰好由藤原先生策划，看到书架上摆着《国家间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国关经典书目的日语版，真是有一种在异乡找到亲人的感觉）。整个课程由东京大学教授们的讲座（内容涉及日本的政治、选举、亚文化、经济、公共外交、中日关系等）、学生讨论课（主题是东日本大地震的日本政府应急机制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江户东京博物馆参观等课余活动组成。政治上从自民党的传统强势到民主党首次获得大选胜利再到其执政不力被自民党取代，经济上从60、70年代无上繁荣再到泡沫破裂，为TPP纠结不堪的今天，日本在战后的起伏也反映着这个世界的沧桑巨变。

课程中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关于中日关系以及钓鱼岛争端的课堂辩论。自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亦因为钓鱼岛争端的僵持或激化而进入冰期。日益崛起的中国和东亚的传统强国日本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积怨和国际形势中寻找和平共处之道呢？东大教授十分坦率地正视两国间存在的矛盾，从国内政治、外交、经济发展、历史四个角度切入分析了中日关系的症结，也从防空识别区的设立以及“中国梦”等现象表示了对中国“崛起”乃至“称霸”的担忧。我明白，对一个国家的认识理解是做出判断的基础，从担忧恐惧到剑拔弩张，国际关系的历史中这样的过渡不在少数。在课后评论中，我这样发言：“中日关系问题对我来说太过熟悉，我在日本占领是建立的奉天千代田小学旧址中度过了我的初高中六年时光，我的许多好朋友来到日本学习，我的家乡的历史和日本这个国家有着太多联系，好的，坏的都有。的确，中国现在存在着反日的呼声，电视上播着抗日神剧，但是非理性的人们是少数，而真正的问题来此双方的误解与媒体的错误宣传。中国从前所未有落后时期中慢慢走了出来，但是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中国人为

自己作为大国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他们对外界的恐惧与不信任也与日俱增。对于两国来说，构建相互的信任是改变关系的基础。”在讨论课上，中日两国学生扮演起对方国家的外交官，其他国家的学生被平均分为两组加入，跳出原本的国家立场去声明“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主权。藤原先生对课程的设计实际上表达了对我们的期待：一名国际政治学生在立足于祖国的同时要学会用不同角度去看待世界，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正所谓我院袁明老师所说的“大国青年，世界情怀”吧。

心怀童真追寻幸福

王燕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发自丹麦哥本哈根

来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参观它的建筑能了解它的历史，去看看它的宣传



栏能了解它的当下。也许很多同学会在课程之余漫步在校园美丽的角落合影留念，而我更喜欢去阅读散布在各个学院的讲座、论坛或者联谊通知。在这样的阅读中，我能感受到哥本哈根大学师生开放思想和积极乐观的行动。在众多宣传文字中，我看到了“the Chinese dream”几个字，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理解当代中国现状的“中国梦”课程。我不由得思考，在拥有完美的生态环境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的童话王国，丹麦人还有什么它们是它们渴望实现的东西，丹麦人还存在所谓的梦想吗？他们为什么会对中国梦产生探索的欲望？

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我们应邀参加了课题组指导老师 Dr.Claus Mathiesen 举办的家庭 Barbecue。远离市区来到雅致的哥本哈根乡村，穿过一个个风格各异色彩鲜明的小房子，远远地看到 Dr. Claus 在门前等候着我们。本以为远离市区的人们会因为地价的优势而选择十分宽敞宛如城堡的大房子，但令我吃惊的是，这里的房子都修建得刚好够人们居住，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巧和实用。人们在这样的房子中住得踏实和满足，这种对现状的安分和对大自然尽可能多的保护心态也许正是丹麦人常常感到幸福的原因之一吧。

吃过晚餐后，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世界杯决赛的开

场。温婉的灯光下拉布拉多正躺在角落里闭目养神，窗外无声的小雨慢慢地融入碧绿的田野，为这静谧的一切都添上了一抹滋润的颜色。Claus 特别向我们介绍了还未归家的大儿子，讲述他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仍然喜欢去杂货店工作的逸闻趣事。世界杯进行到一半大家正全神贯注之时，大儿子静悄悄地就出现在我们身后。他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脸上没有丝毫的疲惫，有的只是一种不易觉察的成就感和喜悦之情。在全民享有终生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国度，即使不工作也衣食无忧，大多数丹麦人的梦想，或者说也是他们已经实现的梦想，就是有一颗自由的灵魂：轻松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追求让自己的内心感到满足和平静的东西。

全力以赴的好时光

王秋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发自澳大利亚悉尼

曲曲折折跨过 70 个纬度，我和另一位参加项目的北大同学 Sherry 终于在夜色中踏进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校园，又经过几番问路才赶到接待我们的食宿中心 Bruce Hall。匆匆忙忙熟悉下校园，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一个人的豪华宿舍，也没有记全十一位同行的小伙伴的名字，为期一周的野外调查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挥别堪培拉袅袅的晨雾，我们一头扎进了凯恩斯的明媚阳光中。两位主管老师 Simon 和 Alistair 开着两辆微型巴士把我们接到了茂密雨林中的小木屋旅馆，并且随车携带了十几

箱食材，此后的几天里，这个安静的小院就成为了我们在热带探险的根据地！

野外调查的内容丰富而繁忙，每天都要消化和吸收海量的新鲜知识。作为一个生态专业的学生，这短短六天的经历可以说让我实现了许多人人生梦想。被称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里，有超多用力仰头也望不到顶的大树，有种种奇怪的鸟叫声，有默默趴在树上吃叶子的树袋鼠和负鼠们，还有软软的落叶层和长满青苔的石头，这里所有的植物都在用力地生长着，用力寻找并吸收着适合自己的营养资源，藤本们攀援向上直达冠层，寄生植物牢牢地扎根在寄主的枝干上，开出妖艳的花朵来；被称为“野生王国”的大堡礁像一座海底的彩色森林，珊瑚的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大海龟悠闲自得地在你身下游过，而你想要伸手捕捉一条色彩斑斓

的小鱼却无奈地发现水中的自己并不自由……

老师们在每个考察的地点都请了独特风格的向导：原住民男孩儿给我们讲雨林中的原始生活，他皮肤黝黑，下巴略微前伸，嘴唇厚厚的，黑色头发卷曲着，口头禅是“yeah~”，能够用坚韧的藤条辅助爬上很高的树；当地的植物学家语速飞快地抛出一连串常见植物的拉丁名，然后带着一副桀骜的神气说“Animals are irrelevant”，光腿穿着雨鞋，挥舞着砍刀从多刺的植物中为我们劈出一条路来；动物学家在深夜领着我们用红外手电找动物，身为头发全白的老者却似乎精力无穷，用激光笔指点着顺便讲讲星座时简直酷炫到令人膜拜；而地理学家是一位年纪已经大到走路都颤巍巍的奶奶，但还是认真地一边画地图一边给我们讲地层、年代史；还有好几位向导都是各种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看起

来像是退休后闲不下来的热心群众们……他们的热情和专注让人很受鼓舞，只要是真心热爱自己的事业，即使有再多的困难都依然能够从中享受到快乐的吧！

充满新鲜感的六天飞速地过去了，在拼命补齐野外日记的节奏中，我们回归了规律的学校生活。从第二周开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都在教室或实验室度过。课堂上，Alistair为我们讲解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也用尽量浅显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前沿研究；Ulrike因为当前主要研究红树林生态系统，所以系统地讲了很多红树林对生态环境研究的指示意义；Simon则为我们介绍了长时间尺度生态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也介绍了许多前人研究中有意思的结果和结论。虽然大部分的基础知识我已经在本科期间学习过，但是因为刚刚亲身体验了独特的热带雨林和红树林生态系统，能够明显感受到对于书本上的知识有了更鲜活的理解，再加上很快就在实验室亲手运用学到的方法来分析野外采集的样品，更要求每个人都对实验原理和意义能够深刻掌握。

站在伯克利山脚的 仰望与远眺

方嘉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发自美国加州

伯克利加州大学三周的暑期项目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Program（环境领导力项目）今年第一次与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简称 IARU) 合作, 纳入大学生参与者。我有幸与其他 7 位分别来自瑞士、丹麦、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日本的学生一起, 与世界各地的环境领导者们一起学习交流。

我们的宿舍在 Foothill Residence Hall, 倚靠着伯克利大学东北部的山丘。向东推开窗仰头, 林海松涛澎湃, 偶有松鼠、小鹿出现, 或疾驰而过, 或悠闲自得。若是回过身来, 向西远眺, 又是另一副景象——由近及远, 是密密麻麻的房屋树丛, 收尽伯克利的全景画面, 天边是旧金山湾区, 大桥在云端若隐若现。在伯克利的生活, 正似我每日回到宿舍最爱做的两件事——仰望与远眺。仰望山之高, 远眺原之广。

伯克利加州大学与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同被誉为美国工程科技界的学术领袖, 无论是教授的水平还是学生的学术素养都很高。在这个暑期项目中, 我们荣幸与近 50 名教授进行了交流, 聆听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思想。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话题, 因而教授讲座的内容涉及自

然、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每日清晨坐在教室里仰头专注地聆听着教授精彩的授课, 手下飞快地记着笔记, 每一句话里几乎都地承载着新鲜的智慧与思想, 就像射进教室的阳光, 点亮内心中那些曾经迷惑昏黄的角落, 一些问题猛然豁然开朗。然而, 每天 8 个多小时的课程不仅仅只给我思想知识上的启蒙, 更重要的是许多重新认识世界, 认识人, 认识自我的视角和方法。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处, 至今铭记——

第一是课程“应用于可持续发展改变的合作型领导力培养”(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for Sustainable Change)。这个课程持续了整整一天, 教大家如何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做到“可持续”——领导力是基于一种合作的思想(无论是领导之间还是领导与团队之间)。因此, 我们从最基本的单元——“人”, 出发, 通过测试了解自己的性格和他人的性格。在认真研究彼此之间的性格时, 我们开始敞开心扉, 开始变得包容, 开始学会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在这个测试分析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进

行了模拟听证会等需要竞争与合作的训练项目, 明显感觉大家相比之前的合作性都有所提高, 团队的气氛更加欢乐融洽。

第二是教授们对城市贫困的看法和思考。在授课的教授中, 有几位是专攻城市贫困的, 包括城中村改造设计, 城市贫困问题机制研究等等, 他们的思想为我提供了观察世界灰色区域的新视角, 让这片阴影中的地方开始有鲜亮的希望之光。一位印度裔的城市规划教授提出: 贫民窟不是城市的绝望之地, 恰恰相反, 那是智慧和活力沉睡的地方, 将来会是城市发展中新的活力聚集点。与此类似的, 一位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设计非洲一个贫民窟改造方案时, 同样也将激发社区创新与活力作为设计的核心思想。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 一直很关注城中村和城市贫困的问题。虽然中国的国情与国外是不同的, 但是最核心的思想最终是殊途同归的, 以一个更高或不同的视角去审视, 取可借鉴之处, 很多难题一定会迎刃而解。C&C

一座城，一所大学，一群人

2014春季学期威尼斯大学游学记

✎ 汪莹



接 到国际合作部通过交换申请邮件的一幕仿佛还在昨天，一转眼，交换生活却已经结束了三个月。此时此刻，回首在威尼斯度过的那一段既长又短的学习生活，除了收获满满，我仍然满心期待，期待着有一天能重回威尼斯，继续去探索这座在每个角落都藏着无限惊喜的小城。

行走在威尼斯城

与很多人的想象相符，威尼斯的“水城”之称绝非虚名，它是由 118 座岛组成的城市，除了最大的本岛以外，还有很多散落周边的小岛。本岛是威尼斯的主要城区，其余小岛各有作用，有的是同本岛一样设施完善的生活区，有

的是一所学校，有的仅有一座教堂和一座图书馆，有的则作为逝去的威尼斯人的安息之所……每座岛内也并非是完全相连的，总有很多小水渠，因此威尼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桥，总共 400 多座。

小桥流水的风景让车在威尼斯全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威尼斯也有明文规定，岛上不许车辆通行，包括自行车，船反而成了威尼斯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然而，在威尼斯也并不如很多人所想，一出门就得坐船。威尼斯的船根据大小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类只能在环绕本岛的大运河上航行，包括人们乘坐最多的公交船；另一类体积较小，可以穿梭在岛内狭窄的水带之间。而这较小的一类，主要包括岛上居民的私家船，相当于出租车的出租船，载游人游览的贡多拉和一些进行日常作业如送信、收

垃圾的功能船。因此，除非是要渡过运河到别的岛去，或者岛内通行距离过远，否则威尼斯人出门更多依靠的是自己的双腿。

在威尼斯的岛上走路，对我来说是最难忘也最有意思的。由于常常高估自己的认路能力，以及低估小巷的复杂性，在威尼斯迷路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每次要走到新的地方去，路痴状态便完全暴露。刚在宿舍安顿好的第二天，我就想利用下午的空闲时间出去走一走，一来可以熟悉一下环境，二来也能欣赏一下风光。当漫无目的地闲逛到太阳下山时，我想应该回去了。此时才猛然发现，自己早已不知道走到哪条小巷里了，求助地图未果，便走过去询问路边一对老夫妇，他们告诉我：“我们也是游客，在这个岛上一下午已经迷路至少 50 次

了，你可以去酒吧里问威尼斯人，只有他们才认路。”就这样，一路问一路走，有时还有热心的威尼斯人带我走一段，待回到宿舍时，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但在可能迷失的走路冒险中，我也曾误打误撞遇到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放着一艘贡多拉的特色书店、威尼斯中世纪画家的学院遗址、百年甜品老店、摆放着各式小提琴的教堂等等。这些意外发现，就像寻宝一样，让我越来越喜欢在岛上漫步或暴走。同时也让我感到，在威尼斯呆得越久，仿佛自己对威尼斯的了解就越少。它的美、它的故事，都深藏在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巷之中，等待有心人去慢慢发现。

我眼中的威尼斯大学

出国交换学习，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母校与对方学校相比。北大从来都以“自由”著称，但与威尼斯大学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威尼斯大学没有固定的校园，尽管威尼斯的地图上都标注了学校的位置，但那其实只是大学那栋号称“主楼”的办公楼地址。威尼斯大学的建筑散落在岛上的很多角落，也许在穿梭于岛上的某个不经意间，你就会路过学校某个院系的所在地。甚至有一些教学楼并不在威尼斯，而是在距离威尼斯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需要坐火车往返。

北大的大部分课堂可以自由出入，即非选课人员，包括校外学生和其它社会人士，都能自由进入北大的教室旁听课程，除非某门课有特别限制。在这一点上，威尼斯大学也一样。而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威尼斯大学较北大更加“自由”，在我看来，甚至有些散漫。

按照威尼斯大学的通知，我于开学之日到校报到，一位在办公室外负责此事的老师看到我后，首先问我，“你有预约吗？”“没有。”在我内心疑惑为何开学新生报到还要预约时，老师将我带到电脑前，教我输入学号、与报到办公室预约。拿到预约条一看，预约的日期已是7天以后。不了解威尼斯大学管理体系的我一下便傻眼了，“一周以后才能报到？那我怎么上课呢？”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你在网上不是能看到想上的课的教室和时间吗？想上什么就上去吧。”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威尼斯大学的学生报到注册与选课并不相互影响，选课与考试也几乎无关。在考试前，学生还需要到网上注册考试，表明你需要这门课的成绩，此时你才真正选了这门课，否则，你可以去听一学期的课而不参加考试，也可以不去听课最后注册考试，只要你认为自己能通过。

威尼斯大学与北大的另一点不同在于，很多课都是小班教学，且讨论在教学中占重要地位。在威尼斯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总是鼓励学生在听不懂或有疑问的时候随时打断课堂提问，跟大家探讨；而在北大，老师有时并不希望学生以这种突兀的方式提问，主要怕耽误课堂时间，以及扰乱教学思路。另外，威尼斯大学的老师更喜欢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学习，甚至有些课程每堂课都会根据教学内容随机分组，进行讨论式教学。这不仅让同学们彼此有更多交流，也能让课堂气氛更为活跃。

不可否认，中国人多的基本国情导致我们的教育资源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相应地，小班教学对北大乃至中国任何高校来说都是一种奢侈，由于学生总是

很多，老师也难以在课堂上开展讨论。这种硬件上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从很多细节上，我们确实还缺乏开展讨论教学的意识和习惯。

热情而不靠谱的威尼斯人

除了风景，在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刚到威尼斯时，拖着一大一小两个箱子的我需要一路翻桥越河，其间总有好心的威尼斯人路过，顺手帮我把大箱子拎过小桥。天色渐晚，迷失在小巷中的我又得到了威尼斯人的援助，他们带着我按照邮件上的地址找到了宿舍。这是我只身一人到达异国他乡时最先感受到的友好和温暖。

之后的生活，自然要不断跟意大利人打交道，而他们的热情和靠谱早已声名在外。一位意大利的朋友自己做了个对比：找德国人帮忙，德国人可能没有什么表示，但没几天就把事情办妥了；而找意大利人帮忙，意大利人会非常热情地答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事实证明，意大利人确实很热情，虽然也有些不靠谱，不过总不至于误了大事。

威尼斯大学的学生证同时也是银行卡，在开学一个多月后，被千呼万唤的学生证才终于陆续发到了学生手上。之后大家便需要到银行去办理开卡手续，这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对我来说却不那么容易。当天下午，我从学校领到了学生证后，便径直前往银行，这才发现一个让我崩溃的问题——银行所有的职员居然都完全不懂英语。我虽然有一些意语基础，但并不足以应付此次交流。况且，之前遇到的人虽然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可几乎都会说简单的英语，而银行职员竟完全不懂，这让我很意外。

“在威尼斯呆得越久，仿佛自己对威尼斯的了解就越少。它的美、它的故事，都深藏在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巷之中，等待有心人去慢慢发现。”

那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用知道的意语单词，跟工作人员艰难地沟通起来。工作人员却很耐心热情，在明白我的来意之后，便帮我办起了业务，开好卡后，由于怕我不会使用附带的网银功能，便把我叫到柜台里面，坐在电脑前，一步步动手给我演示，一边演示一边反复解释，该怎样登录，怎样设置新密码，怎样查看交易等，仿佛多说几遍意大利语，我就能听懂了。待到结束，距离下班时间已经超过了近一个小时。后来同学说我遇上了热心人，若在平常，懒散的意大利人是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工作的。

这也倒是事实，在威尼斯办事，大多都需要预约，没有预约就算再急也不给办，更别提额外加班。在威尼斯，很多机构的工作时间相较中国都很短。银行每天仅工作6小时，邮局每天只有上午开门，威尼斯大学的行政部门每周四不工作。甚至在工作时间内，每天上午11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喝一杯咖啡，聊聊天，不管事情紧不紧急，顾客乐不乐意，“It's coffee time”。到警察局办居留证的我们，便见识了这一盛况。朋友常戏称：“意大利现在经济不行，恐怕跟他们的不靠谱也有很大关系吧。”

意大利人的不靠谱在生活中也有些例证，比如银行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汇款是不是需要手续费，店员算账或找钱时常常出错，丢了银行卡挂失补办需

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小伙伴的居留证直到他们的交换生活要结束了还没有拿到……不过，我也从未因他们的所谓不靠谱而误了大事，可能是没遇上什么大事，也可能是在大事上他们便不是如此作风了。也许，意大利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生活变得更轻松闲适，热情而不靠谱，有时大概比严肃而认真更有人情味吧。

这就是我的交换生活，一座藏满秘密的小岛城市，一所自由开放的大学，一群不靠谱而满怀热情的人。威尼斯的古老独特、安静闲适，有时也会让人觉得仿佛生活在与世界脱节的另一个空间，时间在此停滞，历史也在此定格。对威尼斯人来说，也许生活就是咖啡、美食，以及在华灯初上之时，牵着狗在河边散步。C&C

背景链接

威尼斯大学 (Ca'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1868年由威尼斯省代理省长 Edward Deodati 和一些同仁共同创立，设有经济学院 (Economics)、外国语言与比较文化学院 (Linguistic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文学及哲学学院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heritage)、环境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Environmental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statistics) 等八个学院，学院之间还设有共同的教学和研究中心。

1987年，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发表了一部颇具争议的著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正如女权主义旗手卡米拉·帕利亚后来宣称的那样，这部作品打响了“文化战争的第一枪”，触发了保守的传统主义价值观同激进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抗。

总体而言，布鲁姆的这部著作针砭时弊，富有哲理，本身亦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此书一经出版，即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议题涉及大学生活、人文学科的地位，以及布鲁姆所谓的“灵魂的状态”。精装本销量接近50万册，在长达4个月时间里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保守派评论家罗杰·金巴尔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这样写道，“对于所有心系本国文科教育状况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作品”；作者“(对现实的)慨叹、广博的知识面和透彻的洞察力”倍受金巴尔赞赏(后来，金巴尔本人也对美国大学现状进行了猛烈抨击)。另一批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纷纷揭露布鲁姆对古典时代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特性的错误论述。

25年后的今天，美国“文化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然而人文主义者难免会怀念那段岁月，因为在唇枪舌剑的背后，许多争论者都认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布鲁姆的枪口对准了60年代一批“激进”的师生，对此，美国许多保守派人士总会联想起同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然而，站在80年代末的视角，布鲁姆和其他评论家对60年代人的口诛笔伐，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未能坚守开放性和相对主义的道德与知识立场。不得不承认，针对布鲁姆对现代大



逐渐开放的美国精神

文 杜宁凯（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

2014年11月7日，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知名印度研究学者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教授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在北京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当天下午，为表彰杜宁凯校长在大学教育改革以及印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了杜宁凯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授予仪式。

在北京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杜宁凯校长从对自己所属学科“南亚研究”的反思出发，呼吁美国高等教育直面全球化时代的挑战，重新走向开放。他也希望和北大所代表的中国高校携手，构建全新的文化对话机制。

学的指摘，我很难置身度外，因为书中明确抨击的学科架构正是本人学术生涯的写照。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评判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应以自然为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而非历史学或人类学，才成为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布鲁姆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学说，并认定此类学说“成功打压了西方世界曾普遍持有的知识帝国主义的论调，将西方文化仅仅视为众多文化分支中的一支”。在他看来，“当前关于开放性的教育完全没有关注天赋人权”，这种教育被某种片面主张“初始即有缺陷”的历史主义玷污了。历史学应当树立道德典范，而文化研究应当肯定某些原则凌驾于其它而超然存在。

当然，以下两点是布鲁姆无法接受的：第一，文化和文明研究可以同时具有批判性和道德教育意义；第二，道德观本身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得以广为流传，作者的观点在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中能够屹立不倒，不仅说明了越战后美国的

学术（和社会）变革使人们深感不安，而且也反映出国民普遍不愿接受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之后的几年里登上了世界舞台。二战期间，美国曾派驻军队前往世界各地，包括以中华民国盟友的身份来到中国战场。直到那时，美国方才意识到自己对世界所知甚少。战后，一批美国大学斥巨资启动了“地域研究”，联邦政府及包括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在内的私人基金会也开始资助全球语言文化研究。此类研究的带头人大多是战时曾协助美国政府认识世界的那批学者。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和世界古典文明等领域的专家纷纷前往顶尖的地域研究中心接受培训，他们后来也被全国各地高校聘为本科课程教员。

在此背景下，我开始专攻南亚研究。当时正逢越战，美国的亚洲政策和西方文明的道德形态遭到学生的普遍抨击。美国精神进一步开放，人们不仅愿意接受其他文明的价值观，而且承认这些价值观反衬出美国自身传统中一些根本性的道德缺陷。当然，布鲁姆极力否

认这一点，尽管他对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持有一套奇特的看法，认为多数人承认世界其它地区的重要性即是美国精神走向封闭的新标志。对地域研究的攻击也来自其他意识形态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便是文学批评家兼政治实践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东方主义》中所发表的评论。萨义德指出，西方学者发表的关于东方（中东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术著作，往往一方面赞叹各地的古老文明，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学术研究在挖掘和诠释这些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啻于在学术上，而且也是在政治上鼓吹西方霸权。

历史主义者研究的一项新热点即是追溯知识与权力的世代纠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显然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同时，萨义德的作品也受到了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启发。这部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主要关注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为了解所谓的“第三世界”提供了现代背景。此书揭示了许多关于东方的结论是



◆ 11月7日下午，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杜宁凯教授在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后，佩戴上北大校徽，向数百名师生作题为“一个档案的自传：史学、人类学、印度”的演讲

“我认为，要想建立合适的全球理论，我们必须合作开展全球知识政治项目。从某些方面讲，大学是现有的最成功的全球机构。一方面，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积极构建和传播开创性、批判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学由于促进了全球知识和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交流而在国内备受推崇。”

如何直接或间接地为西方殖民统治服务的，并进而审视了有关古希腊及古罗马时期的知识如何逐步成为西方精英文化教育和价值观的核心，尽管在此过程中莎士比亚成为了教学课程的新典范，因为在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有必要将一批名正言顺的英国文化偶像引入当地大学教材。然而，当那些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也同样致力于挖掘其悠久而璀璨的文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把普世价值观视为西方价值观予以摒弃，不将其作为能帮助它们超越历史包袱、遏制传统宗教观念（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之现代表达形式的自有价值观时，历史主义者的作品必然会遭到颠覆。

在我看来，尽管现有的历史主义者作品标志着作为“西方”认知手段之一的地域研究已“走向成熟”，此类作品却也孳生了各种形式的本土主义。就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伦理研究，以及其他有关边缘化民族和历史的新研究而

言，这些新认知手段均以对话作为其根本特征，而本土主义正在威胁此类对话的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主义者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布鲁姆的慨叹和担忧之一，即道德教育已变得极端消极和封闭。同时，人们意识到世界正变得日益全球化，在许多方面实现了互联，其发展速度和势头也超乎想象，这就要求不同文化、文明、民族和派别之间能更加开放、透彻、紧密和卓有成效地开展对话。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方法诠释美国及其它地区的文化战争，即转而论述社会该如何应对全球化进行诠释。

全球化研究通常主要涉及全球资金流动（投资、市场和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劳动力、生产设施和基础设施成本的外包。随着具备卓越扩展性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全球化和生产消费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病等主要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性问题。然而，尽

管各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历史、文化和社会学的研究却严重滞后。

部分原因是由于人文学科的地位江河日下。历史、文化和社会学不仅在人文学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尽管布鲁姆不以为然），对于拓宽评论视角也大有裨益，且该类研究易于延伸至全球层面。幸运的是，各国已开始意识到人文学科不仅有利于培养个体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所需的理性、观念和和技能，而且能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帮助不同领域的人取得成功。我们无需重塑殖民意识，即可将评论视角拓展至全球层面，并且在不影响道德教育模式的情况下审视西方传统。

由于认识到有必要让学生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一些悠久而璀璨的文明，美国大学于二战后开始引入“亚洲文明”等基础课程。然而，当时大多数美国学者依然认为唯有“西方文明”曾经实现了全面变革，远至文艺复兴，近至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马克斯·韦伯

的作品不仅反映了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密不可分，甚至难以置信的关系，而且由于不同文明的深层历史原因，西方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领域表现得活跃而激进（这一点和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一致）。而目前，人们正在重新审视所有这些观点，特别是因为过去 35 年里，中国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城市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的学术著作一向主张：界定东西方关系（和差异）的通用社会政治理论框架同世界政治经济实力的历史差异存在关联。这些年来，我对殖民主义历史兴致渐浓，而对评价文明的本质差异热情不高。作为文化和人类学领域的历史工作者，与其说我对战争、贸易等帝国主义形成要素的发展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世界历史沿革所产生的知识文化影响感兴趣。虽然我正式开展的第一项学术工作是研究印度的君主政体，我很快就将种姓制度视为认知调整的标志（认知调整是一种解释文化表征以及制度如何体现政治经济史学叙述，并且可以引起共鸣的基本方法）。然而，这一问题的关键终究还在于历史本身。历史是由胜利者而非失败者书写的，我们在官方文本中记录的事件是为了证实现在的情况合理合法，而不是为了加以质疑或批判。然而，历史太过重要，又充斥着太多矛盾，岂可轻易改写。退一万步讲，任何政权或文化都不是以机械方式运转的。每次对历史的重述都会揭示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并遭遇无法预料的复杂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方法和思维这一批判工具总是首先瞄准自己，为什么对历史文献的不断修改既反映了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承认真理永远可望而不

可即。然而，我们可以借助历史背景和当前需求不断检验真理，而且可以将真理视为先验的必然之物。世界文明史的最佳形式是作为真理的载体，而非文化的碰撞。

在我们尝试设计可行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制度，从而以合法、和平、有效的方式开展全球治理、管控和干预的过程中，我们不免会思考如何突破世界主义的一般论调构建文化认同的新模式。此时，关于全球文化传统、信仰、教义、流派的教育研究将发挥根本性作用。或许目前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对全球公民问题展开全新的思考，即我们如何共同参与讨论、设计和落实跨国治理的新模式。为此，我们或许需要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套理论既能包容文化差异，又能参与构建文化对话。

我认为，要想建立合适的全球理论，我们必须合作开展全球知识政治项目。从某些方面讲，大学是现有的最成功的全球机构。一方面，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积极构建和传播开创性、批判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学由于促进了全球知识和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交流而在国内备受推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座新型全球性校园，通过校园互动加速本校乃至其他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汇聚学者，汇聚思想，以期创造新课程、新理论、新观念、新传统，并最终形成新实践。此次我来到北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启动这一进程。感谢北京大学汇聚了这么多学者，并组织了此次论坛。

思考以上问题时，我们会认识到，中国也存在着同美国、欧洲、非洲、拉美、中东及亚洲其它地区相似的“文化战争”。回首当年，美国的文化战争在

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一方认为我们应该以谦卑和开放的心态同世界对话，另一方认为美国没有什么需要向其它国家学习的地方。如果站在后者的立场，美国将一味充当各国的导师，而不再是各国的学生。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继承了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应当认真对待文化和文明，绝不能偏信于这样的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合理性已经包容了所有文化差异和观念。然而，我也相信，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文化对话，当前所有文化战争的胜利一方必然希望开诚布公地同外部世界对话，共同致力于提升各国对人文学科的重视程度。在本项目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大学将发挥根本性作用。它们将有助于各国精神的逐步开放，以期共同抵御并努力应对未来所有的全球机遇和挑战。 **C&C**

背景链接

杜宁凯 (Nicholas B. Dirks)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博士长期致力于历史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他曾先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密歇根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密歇根大学国际研究院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校长和文理学院院长。在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校长期间，他积极推动师资的多元化，大力提升师资水平，加强本科生教育的跨学科和国际化培养，取得了卓越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界的领跑者，杜宁凯博士积极倡导教育的公平性，致力于发展文理学科领域的优质本科生教育。



科索沃六记（上）

文 孔寒冰（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国际政治研究要么上接天庭，要么下接地气，不能在两者之间地自寻其乐。我没有高深的理论修养，也不愿意在所谓框架或范式里面绕来绕去，而是喜欢行走和研究对象的国度里，去看，去听，去感受那里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文化。2014年5月17~24日，我终于来到了我行走版图中的最后“飞地”科索沃，在游走它的东西南北中仔细品味这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叠加而成的活化石。

第一记：“国情”

科索沃位于巴尔干半岛西边，北部是塞尔维亚，南部是马其顿，西南为阿尔巴尼亚，西北为黑山，面积一万多平方千米，人口二百万左右，主要城镇有普里斯蒂那、普里兹伦、米特罗维察、佩雅、吉兰。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前，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而在这之后名义上虽属塞尔维亚，实际上已由联合国托管，管治者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2006年2月，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就科索沃地位问题进行谈判，但因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两年之后，科索沃单方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成国。塞尔维亚则宣布绝对不放弃对科索沃的主权，但承诺不会动用

武力阻止。国际社会对科索沃独立的态度也不一样。“科索沃感谢你”（www.kosovothanksyou.com）网站宣称，截止到2014年5月，已有108个国家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但是，除塞尔维亚之外，包括中国、俄罗斯、希腊、罗马尼亚、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仍然不承认科索沃独立。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早在2006年12月，中国在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设立了一个办公室，隶属于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总体上看，现在的科索沃处于在联合国的政治协调、北约的军事保护和欧盟财政支持下构建国家的过程当中。政治上，根据2008年宣布“独立”之后不久生效的新宪法，科索沃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四年一届。议会共有120个议席，其中，100席属于阿尔巴尼亚族，10席属于塞尔维亚族，其他民族占10席。在2011年2月选出的第一届议会中，科索沃的两个主要政党科索沃民主党（PDK）和科索沃民主联盟（LDK）分别获得34个席位和27个席位。前一个政党成立于1999年，其背景是上个世纪90年中后期与南联盟对抗的阿族武装科索沃解放军。后一个成立于1989年，领导人是主张以和平方式追求科索沃政治独立的鲁格瓦。同时入阁的还有新科索沃联盟（AKR）、塞族政党独立解放党（SLS）等几个小党。曾是科索沃解放军创建者的雅库伯·克拉斯尼奇出任议长，哈希姆·萨奇出任政府总理。就是在笔者到科索沃的前几天，科索沃议会宣布解散，于6月8日提前举行大选，各政党都在

紧锣密鼓地竞选。民主党的另一个领导人、国会第一副议长哈利蒂和国会议员、自觉运动（VV）领导人拉马都是在其党团会议的空余时间与我见面交谈的。根据6月底来自科索沃的消息，在这次大选中，获得席位前三位是分别民主党（37席），民主联盟（30席），自觉运动（16席），后面的是科索沃未来联盟获得（11席），“为了科索沃倡议”（6席），“塞族阵线”（9席），塞族进步民主党（1席），其他少数族裔（10席）。写作此文，科索沃各政党正就组阁问题讨价还价。顺利的话，新政府也得在7月底成立，不顺利的话，新议会可能被解散，重新大选。

科索沃也有“总统”，由议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任期为五年。在2010年底进行的选举中，B.帕佐利当选为“总统”。但是，由于党派斗争，2011年3月“宪法法院”裁定议会这次“总统”选举过程因违宪而无效。最后，在美国驻科索沃大使馆的协调下，各党派同意选举时任科索沃警察总署副署长的A.亚西亚加为“总统”。亚西亚加生于1975年，2000年毕业于普里斯蒂那大学法学系，2006~2007年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进修过。实际上，这位“总统”不过是美国摆在科索沃政坛上的“花瓶”，其资历、影响都无法与“议长”和“总理”相比。

我感触最深的是科索沃的经济发展的低迷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低下。按国际汇率，2011年科索沃的GDP总量为64.52亿美元，人均3534美元。考虑到近一半的人在海外工作，科索沃的GNP要高于GDP。尽管如此，科索沃的经济萧条还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科索沃几乎没有有什么像样的工厂，没有能够支撑国

民经济的企业。城市里最多的是卖杂品的小商店，小咖啡馆，路边最多的是少见有车加油的加油站和拆解旧汽车小作坊。由于经济增长无力，难以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科索沃的年轻人多半都到西欧找机会发展的机会。大到政府开支小到街心公园，都需要外部特别是欧盟的资助。2013年，欧盟援助了科索沃七千多万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科索沃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50%左右，据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比例高达37%。在普里斯蒂那的步行街，在普里兹伦的老城，年轻人或中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坐在街上的咖啡馆，一杯一欧元的咖啡加上免费的白水、一包廉价的香烟，没完没了的聊大天。我问当地的朋友，没有工作，这些人以何维持生计呢？他告诉我，除了政府少许接济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是亲友们从海外汇来的钱，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能有四千左右欧元的侨汇。不过，近年的欧债危机，西欧经济不景气，这也大大地减少了科索沃侨汇的流

入量。在科索沃期间，两个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东部小城吉兰，街道边上站了一排中青年壮汉，每人前面摆着一些用大可乐瓶装鲜牛奶，可买者寥寥。在沙拉山的名胜景点，非常大而且装饰很漂亮的餐厅，吃饭的人很少，我们埋单时服务生连二百欧元的现钞都找不开。至于到处可见的小摊小贩，他们手中的货物就是全都卖出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钱。

去科索沃之前，笔者对科索沃的安全保障心中无底，甚至还制订了许多个人的“应急预案”，但实际上从入境到游走各地再到出境都很顺利。至少在表面上，应当说科索沃社会秩序还是良好，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科索沃人的文明程度并不低，在机动车让人，热情助人，服务周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可必须提及的是，科索沃最棘手的问题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在国家、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仍无认同，相互积怨甚深。笔者分别与两族的许多政治家、学者、大学生



◆ 科索沃首都普里斯蒂那城鸟瞰

和普通民众做过交谈，从没有人说对方的好话，都强调科索沃是自己的，敌对情绪十分明显。两族之间所以冲突少有发生或者可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际社会的干预，科索沃的安全局势全靠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维持。在科索沃各地，人们很容易看到北约各国的部队。印有 KFOR 字样的军车不时地从公路上疾驰而过，一群一伙的北约士兵也到处可见。科索沃境内的许多塞族名胜也都处于北约部队保护之下。

在对外关系方面，科索沃虽然自称有一百多个国家承认，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活动空间有限，接纳它的只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为欧盟和联合国的成员仍是遥不可及的事。同塞尔维亚的关系直接制约科索沃与国际社会接近的程度，近两年来虽然开始对话并有些进展，但要真地正常化还是困难重重。总的看来，科索沃独立成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但在各方面离建构成真正的独立国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第二记：“国旗”

国旗是独立主权国家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象征。通常，国旗通过一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该国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既然独立成“国”，科索沃也必定有自己的“国旗”。根据它的“宪法”，它的“国旗”以蓝色为背景，中间下方是金色的科索沃地形图，上方是六颗白色的星星，代表的是境内的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等、波斯尼亚克、戈兰尼、罗姆和土耳其六个民族。在如今的科索沃，200多万人口中92%是阿尔巴尼亚族，5.3%是塞尔维亚族，

其他民族合计占2.7%。科索沃“国旗”与欧盟旗帜都是蓝的底色，都有星星，据称这种相似性反映的是科索沃民族的多样性和对“返回欧洲”和加入欧盟的渴望

据我观察，在科索沃悬挂最多的似乎还不是这面“蓝黄星”旗，而是阿尔巴尼亚的“红底黑鹰”旗。有科索沃“国旗”的地方，一定有阿尔巴尼亚国旗；而有阿尔巴尼亚国旗的地方，不一定有科索沃自己的“国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科索沃“国旗”和阿尔巴尼亚国旗并列地放在一起，也有再加上欧盟旗帜和美国国旗。说这种现象奇特，是因为按常理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旗是不可以随便挂的。一般来说，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一般不得随意悬挂他国国旗。科索沃自称已是“独立主权国家”，可为什么热衷挂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呢？

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的西南部，领土面积2.87平方千米，人口300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98%。与科索沃不同，阿尔巴尼亚早在1912年就独立成国了。同年启用的国旗底色是深红色，中间是一只黑色双头鹰剪影。据说这面国旗是根据15世纪阿尔巴尼亚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印章而设计。由于鹰是斯坎德培的象征，因此，阿尔巴尼亚也有“山鹰之国”的称谓。在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国体和政治的改变，阿尔巴尼亚国旗也有所不同，但变化的也是双头鹰剪影的图形。

在访问科索沃期间，我多次向不同的人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科索沃为什么要挂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普里斯蒂那大学执行副校长切里姆·切里米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而是向我介绍了科索沃使用国旗的历史过程。他说，在南联

邦时期，科索沃独立问题并不突出，使用的南联邦的国旗。南联邦解体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组建了南联盟，科索沃仍受塞尔维亚控制，但要求独立的言行日趋激烈。因此，1992年到1999年间，科索沃既挂塞尔维亚的国旗也挂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此后一直到2008年，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2008年“独立”之后就使用现在的“国旗”了。在与科索沃商业与技术大学校长埃德蒙·哈伊利齐先生座谈时，会议室的椭圆桌中间摆放科索沃“国旗”和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我又问其中的缘由，他除了重复了科索沃使用国旗的历史演变之后，特别强调说，科索沃的“国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象征，而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则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同一天下午，我在阿尔巴尼亚朋友陪同下拜访了阿尔巴尼亚驻科索沃的大使切马尔·明卓齐先生。他说，国旗实际上是本质的象征。我问：什么本质？他说，阿尔巴尼亚国旗的本质是阿尔巴尼亚人国家的象征。所以，它在阿尔巴尼亚是国旗，但在其他国家则是阿尔巴尼亚民族的象征。比如，在马其顿、黑山等国，阿尔巴尼亚族人聚居的地方也常常悬挂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我们尊重这些“国家”的选择。

至于问及普通民众，他们的回答几乎完全相同：挂“蓝黄星”旗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国家”，挂“红底黑鹰”则意味着“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

“蓝黄星”旗象征着他们梦寐以求的“独立主权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科索沃开始受制于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在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大家庭中，科索沃及生活在这里的阿尔巴尼亚人都属于另



◆ 科索沃国家政府大楼

类。比如，在南联邦时期，科索沃不能是构成联邦的主体单位，而只是塞尔维亚这个联邦主体单位治下的一个地区，尽管它的面积比黑山还大。阿尔巴尼亚人不是主体民族，只能是少数民族，尽管人数比作为主体民族的黑山人还多。不难想象，科索沃和生活在其中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长期压抑之感。南联邦四分五裂之后，这种压抑之感开始迸发。虽然如此，就如 1878 年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1912 年的阿尔巴尼亚，191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2008 年的科索沃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大国势力一手“缔造”出来的。没有北约，没有欧盟，没有美国，科索沃的“独立成国”不可想象。所以，“蓝黄星”旗又反映了科索沃想摆脱南斯拉夫夫人、成为欧盟“大家庭”成员的迫切心境。

“红底黑鹰”旗则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身份的象征，反映的则是更深一层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蓝黄星”旗表明科索沃要“离开”塞尔维亚，那么，

“红底黑鹰”旗则表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要“接近”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阿尔巴尼亚“族旗”。科索沃南部的历史古城普里兹伦曾是阿尔巴尼亚人文化中心，1878 年在这里召开的阿尔巴尼亚人代表会议曾勾划出“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阿尔巴尼亚”蓝图。但是，这个蓝图 1912 年被欧洲大国撕碎了，它们“制造”出来的阿尔巴尼亚只是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不包括科索沃、黑山和马其顿等地阿尔巴尼亚人。于是，诞生于科索沃的那个“大阿尔巴尼亚”蓝图就成了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梦想”。在内心深处，科索沃“独立”不过是阿尔巴尼亚人实现这个“梦想”的重要一步。

第三记：“国梦”

所谓“大阿尔巴尼亚”，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它主张按历史的和现实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阿尔巴尼亚。讲“大阿尔巴尼亚”一定离不

开普里兹伦。普里兹伦位于科索沃的南部，离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比较近，是科索沃的第二大城市，人口接近 18 万。普里兹伦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始建于古罗马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普里兹伦先后受制于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在 14 世纪中叶，它曾是塞尔维亚政治和宗教中心，有“塞尔维亚的拜占庭”之称。1389 年科索沃战役之后，普里兹伦开始受土耳其的统治，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重镇。也就从这里起，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越来越少，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移民越来越多。到 19 世纪中叶，普里兹伦的阿尔巴尼亚人比例超过 70%，成了巴尔干半岛上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文化和地理中心。

今天的普里兹伦，依稀可见往日都城的风采。一条不宽的小河将普里兹伦分成两部分，河上有一座 14 世纪修建的古石桥。这种石桥在南前地区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其是有名的还有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拉丁桥和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的瓦尔达尔桥。河的一侧看上去非常繁华，一家挨一家的小商铺，河边和路旁几乎全都是咖啡馆，一座高大但门可罗雀的东正教与一座同样高大但人头朱攒动的清真寺。清真寺背后的高山上还有一座古城遗址。所有这些都隐隐约约地告诉人们普里兹伦与塞阿两族的历史渊源。

“大阿尔巴尼亚”的主张最早就诞生在普里兹伦。在古城堡下面的河对面，有一组低矮的白墙红顶和黑门窗的建筑群，其中最高的建筑也不过两层。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革命圣地”——普里兹伦同盟博物馆。

被土耳其奥其曼占领之后，阿尔巴

尼亚人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最有名的是斯坎德培领导的武装起义，从1443年起坚持了25年。1878年俄土战争之后，各大国出于自己的私利，无视阿尔巴尼亚人的存在，如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说成是土耳其人，把信仰东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说成是希腊人。更为严重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地方面临着被黑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试图将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阿尔巴尼亚人联合起来。于是，在1878年6月柏林会议召开前夕，来自各地的阿尔巴尼亚人代表齐聚普里兹伦。为了维护阿尔巴尼亚人的统一，这次会议建立了统一领导机构——“普里兹伦同盟”。博物馆的放口处有一个标牌，上面写着“1878年，普里兹伦同盟”。同年11月，普里兹伦同盟在一份纲领中提出，未来阿尔巴尼亚国家的领导应当包括雅尼纳（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和伊庇鲁斯）、斯库台（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和北部）、科索沃（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及塞尔维亚的南部和马其顿的大部分）。这就是“大阿尔巴尼亚”构想。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普里兹伦同盟的领导下进行维护阿尔巴尼亚人的统一、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斗争。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反土联盟同土耳其交战的主要战场。根据巴尔干反土联盟各国达成的协议，将土耳其人从巴尔干赶走之后，阿尔巴尼亚人的土地将由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瓜分。面对被瓜分的危险，1912年11月，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建立一个包括巴尔干半岛上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但是，这种做法与

巴尔干同盟国家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俄、法、英、意、德、奥等六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虽然承认了阿尔巴尼亚在形式上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实际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六大国的手中。更为主要的，独立后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和人口都不及阿尔巴尼亚人所希望的一半，许多阿尔巴尼亚人被留在相邻的国家里。其中，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直到1926年才划定。

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人就成了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的一个跨界民族，分布于阿尔巴尼亚（约300万）、科索沃（约220万）、马其顿（约51万）、希腊（约6万）、克罗地亚（约5万）、黑山（约5万）。实现“大阿尔巴尼亚”就是这些阿尔巴尼亚人的联合，而首先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合并。然而，真有这种可能吗？在很大程度上，“大阿尔巴尼亚”是针对国际社会的，内涵所及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假如真地将它提到日程上来，问题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访问科索沃期间，我就此与一些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人交谈过。他们都承认，无论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还是这两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都有很大的差别。就前者而言，阿尔巴尼亚1912年就独立成国了，而科索沃一直从属于塞尔维亚，直到2008年才宣布独立。阿尔巴尼亚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教育与科学都很发达，而科索沃在这些方面十分落后，1969年底才建了普里什蒂纳大学。就后者而言，阿尔巴尼亚宗教色彩比较淡，有30%的人信奉东正教和天主教，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基本是穆斯林，而且非常虔诚。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自己讲的阿语是正宗的，而科索沃阿族人讲的阿语是一种方言。至于说其他国家的

阿族人，由于在国民中所占比例比较低，同时受各自国情的制约，他们对“大阿尔巴尼亚”的认同程度和追求程度都较为有限。

更为关键的是，巴尔干的地区政治、欧洲政治甚至国际政治都不允许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出现。巴尔干有史以来就是东西方大国都有染指的地方，大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可以说，这里的国家都是各大国讨价还价的结果，而非各民族自主选择。巴尔干地区版图的变更，可以大国碎片化，变成若干小国，对大国没有损害，大国不会阻止甚至还明里暗中鼓励。比如，前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但是，如果疆界变更造就了一个新的地区性大国，那不利于大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大阿尔巴尼亚”不仅需要阿尔巴尼亚与科索沃的合并，还需要黑山、克罗地亚、希腊等国的阿族人分离出来。这样一来还会在巴尔干引起连锁反应，不利于地区稳定。与我交谈过的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政治家都提及了这一点，也都认为“大阿尔巴尼亚”不是一个现实问题，或许将来在欧盟之内才有可能。C&C

背景链接



孔凡君，笔名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资深的中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与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

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北大留学生校友罗明访谈录出版

罗明，本名拉穆鲁斯·布杜拉（Romulus Budura），罗马尼亚籍。1931年11月8日，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农民家庭。罗明于1950年来华留学，1952-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获本科毕业证书。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如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乔治乌-德治、罗斯托伊卡、波德纳拉希、毛雷尔、齐奥塞斯库等，中国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华国锋等。此外，罗明还在一些多边国际场合近距离地接触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会见过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并且于1990-1995年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2010年8月下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凡君（孔寒冰）教授前往布加勒斯特，对罗明大使和他的夫人萨安娜女士（1950年与罗明一起来华留学，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罗马尼亚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做了50余小时的访谈，本书即是这次口述访谈的精彩呈现，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罗明的口述对于了解冷战时期中罗关系、中苏关系以及研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情况都有着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for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ffairs
Peking University

www.oir.pku.edu.cn